

2022年第1期 总第16期

“一带一路”学术参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主办



目 录

2022 年第 1 期（总第 16 期）

资讯焦点

“一带一路”大型水电站项目并网发电，非洲三国受益	1
共建“一带一路”民生项目稳步推进	1
《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发布	3
综合消息：引领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为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4
欧洲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中欧领导人会晤	4
一季度中越班列开行列数同比增长27.3%	5
中新自贸协定升级及经贸合作座谈会召开，与会代表共话发展新机遇	7
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医药开放阔步前行	8

深度透视

国际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多边议程化	10
让绿色成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加鲜明的底色	12
中欧贸易两位数增长印证双边合作互利共赢	16
有一种魅力，叫共建“一带一路”	21

交流与成果

学者成果

时空变迁与复合结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29
--------------------------	----

学术前沿

智库报告

中国OFDI、空间溢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37
基于人粮关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研究	38
“一带一路”供应链安全研究	3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水平评价	40

政治法律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蒙双边投资协定的升级	41
法治“一带一路”的内涵与构建路径	42
超越西式全球化：“一带一路”与全球化再造	43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幸福效应	44

经贸金融

“一带一路”倡议会提高企业成长性吗？	46
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双向贸易成本	46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吗	47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效率研究	47
物流绩效对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48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49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增进效应	49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绩效的促进效应研究	50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煤炭进出口的影响分析	50

资 讯 焦 点

1、“一带一路”大型水电站项目并网发电，非洲三国受益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03-19)

【作者】白波

【正文】3月16日，经过72小时试运行后，由中国企业总承包的马里古伊那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作为“一带一路”沿线西部非洲的标志性工程，不仅助力当地逐步摆脱“电荒”，还能同时令非洲三个国家受益，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益。

马里古伊那水电站项目是“一带一路”沿线西非区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中国电建EPC总承包。工程坐落于马里境内的塞内加尔河上，坝高19米、总长1317米，库容1.36亿立方米。厂房内设计3台轴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40兆瓦。

项目建设期间，为当地提供了数千个就业岗位。投产后，将通过区域电网向马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三国输送电力，进一步促进西非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2、湖南前2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进出口额增长31.2%

【来源】经济参考报网(2022-03-22)

【作者】张玉洁

【正文】记者日前从长沙海关获悉，今年前2个月，湖南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进出口255亿元，增长31.2%，高于外贸整体增幅，占同期湖南省进出口总值的3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湖南省的重要贸易伙伴。数据显示，前2个月，湖南对东盟进出口148.4亿元，增长46.4%，其中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主要贸易伙伴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长沙海关分析，湖南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增幅高于整体增幅的原因在于，湖南逐步打造世界一流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和中小航空发动机产业集群，优势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湖南对沿线国家贸易的高速发展。前2个月，湖南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装备制造产品37.7亿元，增长29.8%；出口轨道交通装备1.3亿元，增长435.4%；出口航空航天技术类产品增长33.4%。同时，湘南湘西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也发挥了较好的产业集群带动作用，前2个月，湖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59.3亿元，增长38.8%。

值得一提的是，RCEP为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注入了新动力。湖南省出口的服装、纺织物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工程机械、新材料、手机零部件等新兴产品，符合东盟国家消费和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增长的需求。

3、共建“一带一路”民生项目稳步推进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03-27)

【作者】闫韞明，周輶，孙广勇，曲颂

【正文】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入，一批民生项目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稳步推进，帮助当地民众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印证了“一带一路”是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是惠及各国人民的“幸福路”。

建立网络中心 埋下希望种子

距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约 20 公里的吉素来 44 区，是当地较大的一处中低收入社区。在社区一栋黑白色的砖混结构老楼里，有一家提供远程教育的诺联互联网中心。每周六下午，11 岁的莱文·查马都会准时来这里参加在线远程学习，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在網上给孩子们教授语言、文化、数学等课程。闲暇时，各地的学生在网上分享自己家乡的风景和文化，查马也经常把肯尼亚的特色食物和当地风土人情介绍给大家。

诺联互联网中心是中国人周涛在肯尼亚创立的非洲诺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业务，旨在为内罗毕郊区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远程教育服务。

周涛介绍，他们最初只是希望创建一个数字服务中心。经过考察后发现，如果建立一个互联网中心，不但可以更好地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还可以将中心作为窗口，帮助当地人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我感觉，做这些非常有意义”。

在内罗毕，像吉素来 44 区这样的中低收入社区不少，对实惠的互联网服务需求巨大。2018 年，诺联公司与中国电信合作，结合 WiFi 技术和城域光纤网，开始为当地居民提供性价比高的无线宽带网络服务。在推出不同优惠套餐的同时，公司还开办诺联学校，通过网络平台，免费为当地 5 至 15 岁孩子提供远程教育。

2020 年初，诺联互联网中心正式运营。在第一节公开课上，中心邀请了两名当地大学生与孩子们分享他俩的求学经历，向孩子们讲述“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活动结束后，一个孩子开心地总结那节课的收获：“通过努力就能获得好的回报。”“这就像一粒种子埋进了土壤。他们未来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生活。”周涛说。

截至目前，诺联公司已在吉素来 44 区和金曼门区发展了 6.5 万名宽带注册用户。周涛告诉记者，他的心愿是“乘着中非合作的东风，借助互联网手段，让非洲民众更好地与中国、与世界联结”。

利用雨水收集 织出片片“绿洲”

春天来了，科威特西北部荒芜的沙漠深处呈现出一片别致的“绿意盎然”——300 多万块绿色“积木”搭建成的雨水收集系统，正助力穆特拉新城“海绵城市”的建设。

穆特拉住房基础设施建设是中科“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民生项目。项目建成后能解决科威特 40 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其中 8 个街区的配套基础设施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如今，配套的雨水收集系统建设正在中外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全速推进。

科威特雨水不多，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常常被忽略，偶尔的暴雨就会引发城市内涝，有时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穆特拉新城配套的雨水收集系统建设是科威特政府在本国城市化建设中的首次实践。

这一项目的雨水收集系统规模庞大，52 个渗透池总容积约为 65 万立方米。其中，超过 1 万立方米的渗透池 39 个，最大的可达 2 万立方米。渗透池内整齐排列的“积木”，就是雨水收集系统的核心结构，也是建设“海绵城市”的重要支撑。雨季时，分布在各个街区地下的渗透池有效收集地表雨水，然后在 48 小时内将内部水回灌地下。未来，这些分布在各个街区的渗透池将服务于穆特拉新城的水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由中外员工组成的工程技术团队，通过与科威特大学合作，开展了沙漠地区大面积雨水收集和渗透系统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动了产学研深度融合。

如今，在茫茫沙漠上的穆特拉新城，已有许多居民在这片科技与希望绘制的版图上建起了自己的新家。“感谢中国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排除各种困难，顺利完成项目的建设和移交，我们的新别墅已经在完工的地块上开始修建了。”居民代表哈利德高兴地说。

架起新铁索桥 奔向幸福生活

“看这里，1、2、3……”随着“咔嚓”一声，卡斯齐纳抱着儿子挽着父亲，在重建的特莱尔铁索桥前，留下了一张祖孙三代的珍贵合影。

卡斯齐纳是尼泊尔甘达基省拉姆郡市马相迪3村村民。村口的马相迪河奔流千年，将安纳普尔纳山劈成了两半，河对面是马相迪7村，是通往20公里外贝西沙尔镇最大集贸市场的中转站。

过去，3村村民要到对岸的7村或更远的集贸市场，只能靠摆渡或绕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马相迪河上搭建起特莱尔铁索桥，成为马相迪3村村民赖以过河的唯一捷径。卡斯齐纳曾无数次走过这座桥，去对面的7村上学，学业完成后找了一份建筑施工的工作，还不时在农产品贸易市场兼职，并从7村娶到了心爱的姑娘。

一晃近30年过去，随着雨水的冲刷和地质灾害的影响，铁索桥两侧的桥墩出现很多裂缝，日久失修的铁索桥变得老态龙钟，也有了安全隐患。

为减轻承重，确保安全，每次过桥，村民们必须“轻装上阵”，村里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农畜产品只能由三轮车装载，盘山绕路运往集贸市场。

得知桥梁年久失修严重影响马相迪3村村民出行，中国电建尼泊尔上马相迪A水电站决定帮助当地重建一座更安全实用的新桥。上马相迪A水电站是尼泊尔境内首个由中国企业集开发、建设、运营为一体的项目，也是尼泊尔水电建设史上第一个提前实现发电的水电站。2017年投运发电后，为尼全国电网提供了5%的稳定电力供应，极大改善了首都加德满都和旅游城市博卡拉的电力供应。

在当地政府配合下，建桥项目很快启动。卡斯齐纳和父亲以及10多名村民踊跃报名加入建桥队伍。3个月后，一座崭新的特莱尔铁索桥横跨马相迪河，验收合格后被正式移交给当地政府。

如今，卡斯齐纳和村民们可以把村子里更多品质优良的农作物运往河对岸的集贸市场出售，“再过几年，儿子到了上学年龄，就可以步行到河对岸上学，我们家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卡斯齐纳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满怀憧憬。

4、《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发布

【来源】经济参考报网(2022-03-29)

【作者】本报记者

【正文】记者3月28日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围绕推进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合作、推进境外项目绿色发展等提出15项具体任务，明确到2025年，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绿色示范项目引领作用更加明显，境外项目环境风险防范能力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走出去”企业绿色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境外项目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完善，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军表示，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提出以来，中国与29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承诺“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共建“一带一路”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与此同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加剧，共建国家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需求更加强烈，绿色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着空前的机遇。

为此，意见聚焦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合作作出具体部署。意见强调，深化绿色清洁能源合作，推动能源国际合作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鼓励太阳能(8.800, 0.01, 0.11%)发电、风电等企业“走出去”，推动建成一批绿色能源最佳实践项目；鼓励企业参与境外铁路电气化升级改造项目，巩固稳定提升中欧班列

良好发展态势，发展多式联运和绿色物流；持续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用好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撬动民间绿色投资。

同时，规范企业环境行为，切实防控境外项目生态环境风险。意见提出，压实企业境外环境行为的主体责任，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做好项目投资建设前的环境风险识别和防范，加强建设运行期的项目环境管理，切实有效防范境外项目气候和生态环境风险。意见还提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环境挑战。

“按照意见要求，绿色发展理念将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中，为共建国家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保障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绿色必将成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加鲜明的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张继栋说。

5、综合消息：引领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为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欧洲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中欧领导人会晤

【来源】新华网(2022-04-04)

【作者】唐霁，陈晨，邢建桥，等

【正文】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第二十三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1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中欧关系、乌克兰危机等问题提出的重要主张，认为会晤为双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战略引领，为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比利时赛百思中欧商务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巴尔丹高度赞同习近平主席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主张。巴尔丹认为，这些重要主张符合欧洲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

位于法国巴黎的ESCP高等商学院常务副校长莱昂·劳鲁萨认为，习近平主席就中欧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主张，体现了双方在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稳定、繁荣方面的共同愿景。多年来，欧中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人文交流、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等多方面进行合作，双方合作稳定发展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他还表示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当前形势下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的重要主张。

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贝尔纳·阿夸耶表示，此次会晤为未来欧中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社会发展、能源等各领域进行深度合作指明方向、注入动力。欧中友好关系是双方在各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

在克罗地亚普拉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布拉尼米尔·维德马罗维奇看来，当前形势下，欧中领导人进行会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欧中经贸合作紧密，未来双方在绿色能源等领域具有广阔合作前景。

芬兰工业联合会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主任蒂莫·沃里认为，欧中领导人会晤非常重要，对话和共同行动有利于欧中应对共同面对的各种挑战。

斯洛文尼亚国际政治专家乌罗什·利普什切克说，欧中各层面合作对双方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期待双方未来采取新的务实措施，进一步推动合作。

德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教授霍斯特·勒歇尔表示，作为彼此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欧中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还将为全球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欧中应进一步加强经贸关系，这将造福双方企业和人民。

波兰《论坛报》主编彼得·加齐诺夫斯基认为，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欧中作为世界上两支重要力量，能够为危机的解决作出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能够增加各层面

的沟通协调，携手应对挑战、解决问题。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奥·里奥斯表示，欧中都希望乌克兰危机尽快结束。实现和平是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条件。欧洲应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加强对话，尽快找到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解决方案，为欧洲建立稳定的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作家莱娅·贝西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欧要做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以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她认为，解决乌克兰危机，坚持劝和促谈非常重要。面对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影响，欧中更需要加强多领域合作、交往，共同应对挑战。

6、一季度中越班列开行列数同比增长 27.3%

【来源】新华网(2022-04-05)

【作者】陈一帆

【正文】新华社南宁4月4日电（记者陈一帆）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季度中越班列累计开行98列，发运标箱2940个，分别同比增长27.3%、34.1%。

今年以来，广西铁路跨境运输业务发展迅速。一季度从中国开往越南的中越班列共计57列，同比增长128%，出口货物以机械设备、电子类产品为主，“中国造”越来越受东盟国家欢迎。一季度进口水果运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截至4月1日，凭祥铁路口岸共进口水果11366吨。

据介绍，目前中越班列承运货物已涵盖中药材、水果、机械设备等200多种品类。为保证跨境班列顺利开行，南宁车务段提前对列车进行出境编组，减轻凭祥站列车编组压力，并提前与海关、外贸企业等联系，掌握出入境车流情况，保证列车高效通关。

7、2021年末外债余额 27466 亿美元，境外投资者继续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

——中国外债规模适中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04-05)

【作者】邱海峰

【正文】扩大高新技术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本币外债余额占比提升……过去一年，中国外债情况又有新变化。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7466亿美元，较2020年末增加3458亿美元。

近年来，中国外债规模持续增长，背后原因有哪些？总体形势怎么看？外债管理改革如何进一步推进？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及相关专家、企业。

满足融资需求，符合发展规律

——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不断扩大开放，吸引境外资金持续流入，推动外债规模增长

在广东肇庆，金田铜业有限公司的新产品项目最近正加快推进。公司总经理励峰介绍，他们主要经营铜管、铜棒、漆包线等制造、加工、销售及相关货物、技术进出口，去年以来经营状况较好，今年又陆续新上了两批项目。他告诉记者，由于产量大、原材料单价高等原因，公司资金需求较大。“去年，公司借了2笔外债，折合人民币1.92亿元。随着新项目建设、投产，我们还会有借用外债的需求。”

企业借用外债，是中国外债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在充分比较境内外借贷成本等因素的情况下，适当借用外债可以有效满足融资需求，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除了企业借债，外债还包括哪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统计规则，中国全口径外债统计的是居民（境内主体）对非居民（境外主体）承担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按照债务工具可分为贷款、债务证券（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和外国投资者投资境内人民币债券）、货币存款（如非居民在境内银行的存款）、贸易信贷与预付款（企业因贸易资金收付和货物所有权转移时间不同而产生的负债，包括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和直接投资：公司间贷款五类。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中国全口径外债规模持续稳健增长。截至2021年末，外债余额27466亿美元。外汇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分析，外债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吸引境外资金持续流入；稳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为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持续推进外债便利化改革，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扩大开放以及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认可，外债总规模有所增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与客观需要，是正常现象。”温彬说，从总量看，相较于同等经济规模国家，目前中国外债总体规模适中。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外债最新数据（2021年末数据将在今年4月公布），截至2021年9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26965亿美元，规模排名全球第十位，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的外债余额分别是中国的8.5倍、6.8倍、3.6倍和1.8倍。

风险总体可控，结构持续优化

——外债负债率、偿债率等主要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整体水平

外债规模持续增长，怎样看待其风险情况？

温彬介绍，国际上用于衡量某一经济体外债潜在风险的指标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于衡量一经济体外债偿付能力的指标，如负债率（外债余额/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一经济体外债规模与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和债务率（外债余额/贸易出口收入，反映外债的可持续性，通常出口能力越强表明外债清偿能力越大）等；另一类是衡量一国是否有足够流动性履行短期外债偿付义务指标，如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反映当一国偿还外债的其他支付手段不足时，可动用外汇储备资产来偿还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的能力）等。

根据外汇局最新数据，2021年末，中国外债负债率为15.5%，债务率为77.3%，偿债率为5.9%，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44.5%。上述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分别为20%、100%、20%和100%）以内，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整体水平。

“综合来看，中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温彬说，需要指出的是，评价一国外债情况，不能只盯着规模，更要看结构，尤其是币种、期限以及债务工具等方面的变化。

日前在香港，中国人民银行成功发行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此次发行受到境外投资者广泛欢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组织踊跃参与认购，投资总量超过220亿元，约为发行量的4.4倍。

人民币央行票据受追捧是人民币债券强磁力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债券先后被纳入彭博巴克莱、摩根大通等国际主流指数。摩根大通环球企业支付部大中华区总经理顾玮认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全球投资者将与中国这个重要的市场联系起来。中国债券被纳入相关指数，预计将为中国债券市场带来2500亿到3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国际投资者认可中国市场前景，稳步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债务证券余额不断增长。外汇局数据显示，债务证券在全口径外债余额中的占比由2016年末的16%提升至2021年末的32%，债务证券余额增长占近5年外债规模增长的五成。截至2021年末，国际投资者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值是2016年底的5.6倍。

上述外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债务证券余额增长主要源自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人民

币债券，其中境外投资者超五成为境外中央银行，以长期配置人民币资产而非短期盈利为目标，投资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债务证券占比不断提升，进一步增强了外债规模和结构的稳定性。此外，本币外债占比提升、中长期外债占比增大助推中国外债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币种结构看，由于本币外债偿还时不存在货币兑换问题，不会对外汇市场和外汇储备产生影响，且对企业而言，无汇率风险担忧，故风险相对较小。2021 年末本币外债在全口径外债余额中的占比由 2016 年末的 34% 提升至 45%，上升 11 个百分点，境内机构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有所增强。

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外债在全口径外债余额中的占比由 2016 年末的 39% 提升至 2021 年末的 47%，占比增加 8 个百分点。中长期外债占比上升有利于降低中国外债期限错配风险，减少债务偿付的流动性风险。

扩大试点范围，支持实体经济

——目前，外汇局已在 9 个区域开展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在 11 个区域试点开展一次性外债登记

外债稳步增长，相关管理改革也在持续推进。从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到深化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再到开展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跨境融资……近年来，外汇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提升跨境融资便利化水平。

成立于 2017 年的爱笔（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线下空间数字化与智能化企业。公司财务总监李扬向记者介绍，2018 年外汇局在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外债便利化试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这对我们这样处于初创期、以技术见长的企业来说，是重大利好。此项政策便利了企业统筹使用、灵活调拨境外资金，总体上资金利用效率提升约 20%，企业资金成本降低约 3% 至 5%。”李扬表示，这两年公司业务加快扩张，在全国多地都有项目落地。在此过程中，前期获批的外债额度已使用完，从今年 2 月起开始使用新的额度。

去年，外汇局进一步扩大高新技术企业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根据外汇局数据，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自贸区等 9 个区域开展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

围绕企业普遍关注的外债登记问题，外汇局近年来持续深化外债登记管理改革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除外）可按照企业净资产 2 倍的金额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无需按照借债合同逐笔办理外债登记。

励峰表示，一次性外债登记能大幅降低往返外汇局办理业务的“脚底成本”，大概可以少花 12-15 天时间。“特别是考虑到借外债时需要在合适的窗口期锁定汇率，而以往去逐笔备案期间有可能会错过窗口期。总的算下来，一次性外债登记能为公司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约 250 万元。”

数据显示，外汇局已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等 11 个区域试点开展一次性外债登记。

外汇局表示，将进一步推进外债登记管理改革，适时扩大外债便利化试点范围，多措并举为企业跨境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帮助缓解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8、中新自贸协定升级及经贸合作座谈会召开，与会代表共话发展新机遇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04-08)

【作者】蒋雅妮

【正文】4 月 7 日，由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及经贸合作座谈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与会代表就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的内容及机遇进行了积极热

烈的交流。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在致辞中表示,4月7日生效的《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将为两国带来贸易投资的新商机。两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于2008年4月7日签署,同年10月1日实施。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签订的首个自贸协定。双方于2016年11月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于2021年1月26日签署《升级议定书》。最终在2022年中新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于4月7日正式生效。

许宁宁指出,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今年1-2月份,中国与新西兰贸易额同比增长了22.8%。他呼吁双方尽快将中新自贸协定的文字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合作发展成果,再创辉煌。

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发言表示,中新自贸协定签署以来,一直是两国贸易和经济关系增长的催化剂。升级版协定生效之际正值全球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对于新西兰来说这一类新的贸易工具是政府贸易复苏战略的一部分。两国的贸易关系是互补的,升级版的自贸协定将为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提供平台,双方都将从中继续受益。

中国前驻新西兰大使陈明明在致辞中谈到,《升级协定书》使两国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历史出发点,双方要抓住机遇使两国经贸关系上一个新台阶。

中国驻新西兰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黄岳峰认为,中新自贸协定的升级对双方是重大利好,将催生两国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新机遇,也向世界发出了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将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复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9、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医药开放阔步前行

【来源】《国际商报》(2022-04-08)

【作者】孟妮

【正文】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深化中医药交流合作、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日前出台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为如何加快中医药开放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中国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深入,中医药融入国际医学体系的步伐逐渐加快,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医药国际深度合作基础已经形成。“十三五”时期,中国中医药开放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中药类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大幅增长。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医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救治,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中国中医药开放发展积极推进。中医药将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作用更加显著。中医药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交流不断深化,服务贸易积极发展。

具体而言,在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方面,规划提出,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推进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分享中医药防控疫情经验。在夯实传播应用基础上,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行动,推动社会力量提升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建设质量,依托现有机构建设传统医学领域的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指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设立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基金。推进在相关国家实施青蒿素控制疟疾项目。

在深化中医药交流合作方面,规划要求,巩固拓展与有关国家的政府间中医药合作,加强相关政策法规、人员资质、产品注册、市场准入、质量监管等方面的交流。鼓励和支持有关中医药机构和团体以多种形式开展产学研用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与

技术国际推广相结合。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采用市场化方式，与有合作潜力和意愿的国家共同建设一批友好中医医院、中医药产业园。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中医药交流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打造高水平中医医院、中医优势专科、人才培养基地和科技创新平台。

在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方面，规划提到，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推动中医药海外本土化发展，促进产业协作和国际贸易。鼓励发展“互联网+中医药贸易”。逐步完善中医药“走出去”相关措施，开展中医药海外市场政策研究，助力中医药企业“走出去”。推动中药类产品海外注册和应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在解读规划时表示，由于中医和西医在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上存在本质差别，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发展在文化、技术、政策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和壁垒。为此，将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是贯彻落实《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不断拓展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全面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发展。

二是实施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以中医药海外中心和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建设为抓手，扩大中医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推广与应用，加强标准引领，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与交流互鉴，开展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三是深化中医药交流合作。通过政府间多、双边交流与合作，从传统医学政策法规、人员资质、产品注册、市场监管等方面着手，不断改善中医药海外发展的政策环境，鼓励社会力量采用市场化方式建设友好中医医院和中医药产业园等。加强与港澳台地区中医药交流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

四是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推动中医药服务贸易做大做强，支持中医药企业开拓国际重点市场，支持中药类产品开展海外注册，组织好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大型交易会中医药相关活动。

五是积极推进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加强相关专家团队和平台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下的传统医药高级别论坛机制作用，加强交流互鉴，为有需求的国家提供支持，持续推进在非洲和大洋洲等相关国家实施青蒿素控制疟疾项目，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0、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贡献宝贵确定性

【来源】新华网(2022-04-19)

【作者】傅云威，张一诺

【正文】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开局总体平稳。这份沉甸甸的经济成绩单是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下取得的，得益于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组合。它有力地证明：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和活力，仍将为世界经济贡献宝贵确定性。

面对疫情挑战，中国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科学统筹“救人”与“救市”，兼顾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全力保障经济循环畅通，促进中外合作共赢。

中国尽其所能支持全球抗疫事业，积极开展对外经贸合作，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缓解全球通胀压力作出重要贡献，惠及众多合作伙伴。

去年中国外贸首破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0.7%，与世界分享中国大市场的同时，向全球输送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外贸数据稳，彰显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全球红利，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尤为可贵。

去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首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今年一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5.6%，实现“开门稳”。投资数据稳，展现中国经济的巨大魅力和活力。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中国政策研究室主任玛吉特·莫尔纳指出，中国良好的增长前景和进一步开放的举措将助力持续吸引外资流入。

可以想见，伴随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政策组合效果显现，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将更加顺畅。

乱云飞渡仍从容。面对美联储缩表加息步伐加快、全球流动性趋紧等不利外部环境，中国着眼自身经济周期实际，依托超大市场优势和雄厚外汇储备，奉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展现了调控实力和政策定力，为全球金融稳定贡献确定性。

4月15日，中国央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针对支持实体经济、稳定宏观经济基本面持续发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评价说，中国政府通过危机应对措施、流动性供应、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努力减轻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IMF对这些政策措施表示支持。

面对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负责任作用，并继续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公共产品，稳定中外供应链和产能合作，缓解冲突带来的消极经济影响，为全球发展贡献和平与合作的正能量。

实践证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已经并将继续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贡献宝贵的确定性。

深度透视

1、国际组织与一带一路的多边议程化

【来源】爱思想网(2022-03-19)

【作者】张贵洪(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正文】“一带一路”经历了从倡议到共识、从愿景到行动、从双边到多边的过程，被载入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重要多边机制的成果文件，得到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的多边议程化是指通过多边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加规则化、专业化和机制化，并转型和升级为国际发展议程。多边议程化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而国际组织是推动“一带一路”多边议程化的关键所在。

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共建的创新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的多边议程化有利于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整体推进，争取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更好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最佳路径。

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共建是“一带一路”多边推进的主要体现，走的是和平与发展之路，对中国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建具有示范意义。“一带一路”建设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项发展事业，目的是打造发展共同体。作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一项创新探索，“一带一路”建设有望打造一个国际发展合作、多边发展机制和全球发展治理的新模式。通过发展夯实和平的根基、创造和平的环境，“一带一路”有利于解决和平赤字、推动发展和平、实现持久和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和平是前提，发展是手段。

作为一项创新实践，中国与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有创新理念、创新动能、创

新路径、创新机制和平台。平衡发展、对接发展、包容发展、共同发展的创新理念，既基于中国发展的经验，也契合联合国的发展事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互联互通、以发展促安全、发展伙伴关系的创新动能，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当前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关键所在。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与地区发展议程兼容、开展新型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创新路径，为中国与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创新机制和平台包括用好国际组织资源，大力吸引国际机构入驻，努力推荐中国籍国际职员，积极承接国际会议，以助力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议程是为解决问题而作出的一种程序性安排。与双边议程不同，多边或全球议程往往由国际组织推动，即国际组织通过相关文件把全球性议题和主题转化为国际社会共同行动的正式安排。联合国推动的多边议程具有全球性和权威性，从每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涉及的议题和联合国文件包含的主题来看，最受关注的是和平与安全、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权、难民和移民等。这些议题和主题都有相应的议程，通过国际合作和全球行动来推动。在议程的框架下开展国际合作，推动相关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已成为联合国开展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可持续发展议程。

“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可持续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等方面的理念高度契合，这是“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发展的基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会员国高度认可的发展议程，具有全球性和权威性，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和推动的一项发展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互联互通为重点，围绕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通”开展国际合作，是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强化和补充。“一带一路”倡议的议程化就是通过对接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和伦理、目标和指标、战略和机制、项目和活动，从而达成共识、制订规划和采取行动的过程。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成为国际共识。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40多个国家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说明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比较普遍的认同和支持，但多数发达国家还没有参与共建。另外，与国际组织签订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不多。“一带一路”载入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多个决议文件，但国际组织专门就“一带一路”形成决议文件较少。这说明，倡议要成为国际共识，还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纳入国际组织的战略规划。与国际组织签订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需要及时评估和总结其实施进展和效果。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内容要通过这些合作文件转化为国际组织的发展战略和工作规划，更好地为国际组织的使命服务。例如，基础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和核心内容，也是全球发展的“痛点”。这就需要国际组织统一协调，就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战略规划。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还需要在国际组织框架下形成行动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涉及贸易金融、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文化旅游等领域，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在这些专门领域有专业的规则与经验。“一带一路”可以利用国际组织的资源和优势，在专门机构的框架下推进专业化、国际化和规范化。

对接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发展战略

除了与联合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对接，大量区域性国际组织也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多边议程化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各个地区开放，但重点是周边的亚太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南太平洋等次区域，周边是“一带一路”走向全球的基础。

中国周边存在众多国际组织，它们不仅是周边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和周边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更是推动周边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周边国际组织包括次区域国际组

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跨地区国际组织,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参与的新兴多边组织和机制,如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会议和论坛类国际组织,如东亚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亚信会议等;联合国系统的区域办事处,如亚太经社会等。这些周边国际组织具有多样性、不平衡性和创新性等特点。

周边国际组织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国际组织资源。一方面,“一带一路”与周边国际组织具备对接合作的良好基础,两者存在地理范围上的重合,具有目标和合作原则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周边国际组织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和路径。

从组织性质和特点、成员规模、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化的主要节点机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广泛、合作方式灵活,与“一带一路”有很强的互补性。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带一路”国际化的起点,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多边化的示范。同时,“一带一路”在中国周边的多边推动还有可能催生新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此外,我国还需要加强与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非洲联盟、欧洲联盟等不同类型国际组织的对接合作,以便“一带一路”的多边化在多个地区和多个层面整体推进。

2、让绿色成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加鲜明的底色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2022-03-29)

【作者】张继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

【正文】近日,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底色的总体要求,部署了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产业、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绿色标准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合作,明确了推进境外项目绿色发展、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等重点任务,是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和行动指引。

一、立足全球视野,深刻把握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大意义

《意见》作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顶层设计,对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绿色之路,这与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意见》以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旨在提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绿色化水平,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庄严宣告,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意见》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宣示精神,以更明晰的政策指向、更务实的举措行动,有力推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指明的目标方向,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内核。《意见》充分体现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信心和决心,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鲜明的世界意义,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厚植生态

底色、绘就绿色篇章。

二、坚持统揽全局，统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意见》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突出，生态环保国际合作水平有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约束条件更为严格，需要统筹推进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在政策沟通领域，支持标准对接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一是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标准对接，强化绿色标准在“走出去”中的支撑作用；二是充分尊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权益与战略自主，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三是坚持多边合作，利用现有政府间多、双边机制，积极寻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最大公约数”。

在设施联通领域，推动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绿色低碳转型。一是加强绿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和维护过程中的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打造跨尺度、多层次、相互连接的绿色网络结构，提供全面的生态系统服务；二是加强绿色能源合作，鼓励太阳能发电、风电等企业“走出去”，推动建成一批绿色能源最佳实践项目；三是加强绿色交通合作，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等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绿色交通。

在贸易畅通领域，提升产业合作绿色度，完善绿色供应链。一是提升产业合作中的绿色化程度，着力开展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示范性产业合作项目，鼓励企业赴境外设立聚焦绿色低碳领域的股权投资基金，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向绿色经济转型；二是加强绿色供应链国际合作与示范，支持绿色产品贸易蓬勃发展，大幅提升绿色生产、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等全生命周期绿色贸易水平。

在资金融通领域，构建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有机结合模式。一是推进绿色金融创新，深化绿色产业合作，打造多层次的产融平台，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支持和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二是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框架下，推广与绿色投融资相关的资源准则和最佳经验，促进绿色金融领域的能力建设。

在民心相通领域，加强生态环保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是加强绿色科技合作，支持在绿色技术领域开展人文交流、联合研究、平台建设等合作；二是规范企业境外环境行为，压实企业境外环境行为主体责任，指导企业严格遵守东道国生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国际形象。

三、凝聚强大合力，加快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支撑保障能力

为如期实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目标，需要提供资金支撑保障、合作平台支撑保障、能力建设支撑保障、风险防控支撑保障，加强组织领导、宣传引导、跟踪评估，力争到2025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统筹完善绿色发展支撑保障体系，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一是在资金支撑保障方面，有序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鼓励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绿色融资；二是在合作平台支撑保障方面，积极搭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等合作平台作用；三是在能力建设支撑保障方面，开展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专题培训，建设绿色丝绸之路新型智库，强化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智力支撑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保障。

统筹加强组织实施，确保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重点任务及时落地见效。一是在组织领导方面，加强党对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系统推进；二是在宣传引导方面，不断加强和改进“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工作，讲好共建“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中国故事”；三是在跟踪评估方面，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各项任务的指导规范，及时掌握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评估。

按照《意见》要求，绿色发展理念将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中，为共建国家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保障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绿色必将成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加鲜明的底色。

3、对外开放，过去、现在和未来

【来源】《旗帜》杂志(2022-03-29)

【作者】徐建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党支部书记、司长)

【正文】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温我们党关于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部署、重要政策举措、重大理论创新，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新形势下对外开放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为进一步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宝贵借鉴。

党领导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

对外开放是中国当代发展史上的壮举，归纳起来有8个方面成功经验。一是始终坚持党对对外开放工作的全面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当前和今后的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贯穿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二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依靠不断解放思想，我们成功扫除了对外开放道路上的一道道思想障碍，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获得新的活力和动力，创造了经济社会长期快速持续发展的大好局面。三是始终坚持以开放促改革谋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谋发展，是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历史性选择。从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到设立三资企业，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开放实践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四是始终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坚持结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吸收借鉴于我有利的国际经验、知识、技术等，稳步推动国际贸易、投资等领域制度改革，建立起相对完备、与国际接轨、具备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制度体系。五是始终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注重运用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注重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六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发展模式。实践证明，我国对外开放渐进式发展模式，有效避免了“休克式疗法”可能引发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实施渐进式的对外开放，彰显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七是始终坚持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国际参与。中国始终坚持正确义利观，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承担与自身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八是始终坚持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高度体现了对外开放中的互利共赢原则，是我们对外开放与美西方国家所谓开放合作的本质区别。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处理好4对关系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为全球提供了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十四五”时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着力处理好4个关系。

一是应处理好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更好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只有立足自身，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地生存和发展

下去。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二是应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要扎实练好“内功”,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国内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要坚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重塑经济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三是应处理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经济硬实力的快速增长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日益增强,如果缺乏软实力的支持,必然会在国际上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我国软实力在全球的排名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匹配,有必要推动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步提升。

四是应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健全开放安全保障体系。必须不断强化底线思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不断完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对外合作监管体系和政策工具。必须不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风险防控能力,加快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对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展望

一是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打造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强陆上、海上、空中、网上互联互通,推动构建立体畅通、安全高效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进一步强化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各国资源禀赋优势,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建立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支持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共同参与项目投融资,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等作用。

二是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深化丝路电商合作,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办好进博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活动。提升对外投资合作水平,不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继续引导和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树立中国投资者良好形象。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推动签署中欧投资协定。巩固稳定提升中欧班列发展水平,支持中欧班列沿线国家海外仓建设。扎实推进“丝路海运”品牌建设,着力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国际航运物流新品牌。积极深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弹性和韧性。

三是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加强民心相通工作顶层设计,更好发挥驻外使领馆、社会组织、境外中资企业、智库和高校的作用,为其他“四通”提供有力支撑。积极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打造品牌性示范项目,深入组织实施好“丝路一家亲”行动、鲁班工坊、文化中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等品牌项目,为共建国家和地区民众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强化民心相通支撑环境建设,着力加大正面宣传,丰富传播渠道,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四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进新疆、福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发挥沿海地区龙头引领作用、沿边地区开放门户作用、内陆腹地战略支撑作用。深化共建“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的衔接,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倡议支点建设。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经济开发区、国家级新区等各类开放平台作用,探索构建区域开放重要增长点。支持香港、澳门深度参与和助力共建“一带一路”,举办与共建“一带一路”主题相关的各类论坛或博览会,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

五是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深化与国际和区域发展议程对接,有序推动与合作基础较好、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围绕发展战略和合作规划加强有效对接,落实好已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巩固扩大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加强规则标准对接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完善“一带一路”风险防控和安全

保障体系，强化法律服务保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4、中欧贸易两位数增长印证双边合作互利共赢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2022-04-03)

【作者】邹多为，丁乐

【正文】铲土装车、机器轰鸣，伴随挖掘机上下翻飞，中欧企业共建、总投资额 70 亿元的富凌食品产业园项目日前在广州动工。

“扎根近 50 年，中国已成为集团首要优先市场，我们将继续寻找新的机会，开展更多领域合作。”谈及未来发展，路易达孚集团北亚区首席执行官陈嘉渊信心满满。让这家欧洲企业对植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的，是中欧不断拓展的广阔合作空间。

4 月 1 日举行的第二十三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为中欧未来发展勾画出亮丽新蓝图：“互利共赢仍然是中欧合作的主基调”“打造合作新亮点”“在疫情防控、应对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政策协调”“助力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

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欧经贸合作持续深化：2021 年，中欧货物贸易额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两个月，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8746.4 亿元，增长 12.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4.1%，欧盟反超东盟重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尽管东盟、欧盟在与中国贸易规模上的换位，尚难判断是季节性表现还是一种趋势，但诚如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所言：“无论如何，这都反映出中欧贸易较强的韧性和活力。”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中欧优势互补、相互依存。中国市场已成为许多欧洲跨国企业全球业务的重要支柱。同样，欧洲市场的机遇也吸引着广大中资企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欧经贸发展潜力巨大。

刚刚过去的 3 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贝诺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是中国铁路技术和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对接，也充分表明中欧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础日益牢固，合作前景更加广阔，重要性愈加凸显。

除了“一带一路”众多项目接连在欧洲落地生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中欧班列在欧亚大陆上加速飞驰等结出的累累硕果也有效拓宽了合作领域、确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强劲动力。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联合体，中国继续扩大的高水平开放政策也是促进中欧经贸走深走实的强大助推器。

近年来中国通过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等一系列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面对疫情等挑战，中国依旧是德国企业全球重要的市场之一。2021 年，近六成在华德企实现业务增长，超七成受访企业表示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

“中欧经贸合作的丝丝暖意正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庄芮表示，当前形势下，中欧双方应依托现有对话机制，在航空航天、生物、光电、电子、教育等贸易领域加强政策协调，共同把中欧经贸合作的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从而造福双方企业和民众。

5、专家认为：“一带一路”不会因俄乌冲突停歇

【来源】参考消息网(2022-04-04)

【责编】张威威

【正文】参考消息网 4 月 4 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4 月 2 日发表题为《为什么说乌克兰

兰战争不会导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宏伟目标偏离正轨》的文章，作者系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研究集团执董戴维·多德韦尔。全文摘编如下：

《外交政策》杂志上个月的大标题是《普京的战争扼杀了中国欧亚铁路的梦想》。与此同时，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的内森·赫德森发表在欧亚新闻网上一篇广为流传的报告甚至更加坚定地认为：“这场战争不仅正在让北京付出贸易收入损失的代价，而且还正在将基建投资变成徒劳无功的大包袱。”

我要说：这类报道完全错了。

诚然，俄乌冲突给全球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降低了GDP预测，甚至危害到了全球化。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经济体也在诸多受害者之列。但是，单独列出“一带一路”倡议，既天真又失真。

事实上，俄乌冲突可能反而证明了2013年提出的这一宏伟计划的价值。这种网络或许在我们面临突然不安全的世界时，能够提供重要的稳定作用。

最大的错误就是从一年或两年的角度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或是把它当作独立的投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世界发展关系的百年大计，特别是它横跨广阔的欧亚大陆，一路抵达非洲。

它出于一种信念：支撑中国过去40多年成功的是大规模基建开发，而中国试图加强联系的发展中经济体——如果它们想成为经济强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也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论是公路、铁路、港口、发电站，还是电信网。

欧亚铁路是个惊人的成功。去年，大约有150万个集装箱往来于中国与23个欧洲国家的130个城市之间，在疫情扰乱了海运和空运之际，占中欧贸易的5%至8%。

俄乌冲突无疑扰乱了运输，但长期来看，认为这将产生重大影响是不准确的。

对北京而言，欧亚铁路只是中国争取世界贸易市场准入多样化、减少对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依赖、确保能够长期获得国内长期供应不足的大宗商品渠道的众多项目之一。根据路孚特公司“一带一路”倡议数据库统计，它已包括全球2631个项目，总价值达3.7万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为一个不稳定的世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防御。欧亚铁路短期损失部分集装运输业务，不会让中国人夜不能寐。

6、中欧关系稳定利于世界稳定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04-04)

【作者】苏晓晖

【正文】4月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习近平主席希望欧方“同中方一道，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为动荡的世界局势提供一些稳定因素”。

中欧关系行稳致远，首先要“自主”。中欧有着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础，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第三方，也不受制于第三方。中方始终从战略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中国对欧政策保持稳定坚韧，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欧方也应从自身利益出发，坚持战略自主，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然而，某些势力并不愿看到中欧关系稳定发展，不断编造“中国威胁论”，称中国为“制度性对手”，甚至挑起制裁和对抗。对此，中欧应提高警惕。

中欧关系行稳致远，需要明确方向。在视频会见中，习近平主席重申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三个定位，并注入新内涵。中欧要做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以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当前，欧洲战事又现，世界面临分裂对抗风

险，霸权强权和集团政治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中欧要带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中欧要做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以中欧开放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2020年6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视频会见米歇尔和冯德莱恩时就指出，中欧两大经济体应该发挥世界经济“双引擎”作用。去年，中国和欧盟贸易额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中欧班列开行15000多列，同比增长29%。事实说明，中欧经贸关系高度互补，双方可进一步发掘潜力。中欧完全可以深度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深化利益融合，促进共同增长，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更大作用。

中欧要做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以中欧团结协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和欧洲都是东西方文化重要发祥地和杰出代表，几千年来相互促进、相映生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中欧需要加强友好交流，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习近平主席建议中欧继续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合作，携手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欢迎欧方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米歇尔和冯德莱恩也表示，愿同中方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

当前国际形势下，中欧加强对话合作十分必要。中欧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提出解决危机的几点意见。除了要坚持劝和促谈、防止出现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构建欧洲和亚欧大陆持久和平，习近平主席还指出，要防止局部冲突扩大化。不能把全世界都捆绑到乌克兰危机这个问题上，更不能让各国老百姓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目前这样的局面可能使国际经济合作几十年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为避免不可挽回的后果，中欧要致力于管控局势，防止危机外溢，特别是要维护世界经济体制、规则、基础的稳定，增强人们的信心。

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意义重大。在世界不安宁的时刻，各国需要的是团结而非分裂，是对话而非对抗。中欧作为两大全球力量，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合作共识，将为动荡加剧的世界带来稳定因素。

7、以共建“一带一路” 促高质量共同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2022-04-04)

【作者】胡必亮(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经济学教授)

【正文】过去一年多来，尽管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但共建“一带一路”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又有多个国家加入共建“朋友圈”。目前我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2021年开行15000多列，同比增长29%，截至2022年1月29日，中欧班列累计通达欧洲23个国家180个城市；跨境电商海外仓近2000个，大幅增长80%多；中老铁路、以色列海法新港等一批重大建设项目顺利竣工；我国进出口总额2021年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大关，比上年增长21.4%，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3.6%，比整体增速高出2.2个百分点；2021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增长3.2%，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增长14.1%。到2021年年底，我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其中许多提供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其有效抗疫提供了重要支持。总之，“一带一路”各项建设事业继续表现出逆势向上、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目前，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疫情呈进一步蔓延之势，加上俄乌冲突及其背后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扑朔迷离。如何进一步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需要更加成熟的思考。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外国元首时，

特别提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开展合作的基本原则、努力方向、重点工作等,为我们提供了基本遵循。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认识和理解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进一步明确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和使命,全面、准确地理解新发展理念及其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联系,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促发展:为共建国家发展注入新动能

尽管当前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热爱与追求并没有发生改变。二战以来,超过三分之二世纪的时间内没有发生世界大战,和平大环境保证了国际合作与全球发展事业进展总体还是比较好的。尤其对于发展而言,目前作为发展基础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2020年全球人均GDP只有10925美元,世界上只有80多个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其余的130多个国家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因此人们普遍渴望得到进一步发展。2021年的数据显示,在14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国)中,高收入国家只有35个,占23.5%,其余的76.5%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这149个国家的人均GDP只有9032美元,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83%。因此,如何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仍然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倡导与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支持和帮助共建国家加快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发电厂、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产业园区、制造业等建设,快速实现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这一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发展中国家往往都面临资金短缺。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中国既为共建国家提供条件优惠的融资,同时也对这些国家开放市场,为共建国家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新动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据粗略估算,从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截至2021年9月,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10.4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300亿美元。

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水平更高,产业联系更紧密,进而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促进了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正在被打造成造福世界的“发展带”。

惠民生:为共建国家人民谋幸福

中国积极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最根本的落脚点是为相关国家人民谋福祉、谋幸福,使当地民众能够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将本着开放包容精神,同愿意参与的各相关方共同努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倡导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一方面是从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中得到启示,希望更多发展中国家也能尽快消除绝对贫困,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全球减贫目标。

中国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基于自身的扶贫经验,从2017年开始,中国在老挝、柬埔寨、缅甸3个国家选择6个村庄,实施为期3年的“整村推进”和“精准扶贫”试验,重点做了四项工作: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建设实现基建脱贫,包括修建铁路、公路、港口、桥梁等方式,实现对贫困地区的“超级连接”;二是通过“一带一路”产业项目实现产业脱贫,主要依托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如传统手工业、特色旅游、中草药种植,发展当地有优势的养殖业和发展庭院经济等;三是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实现脱贫,主要是雇佣一些员工从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岗位和职业;四是直接通过援助方式帮助受援地区及其人民减贫,如中国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6个100”项目支持就是典型案例。结果是,3国6村的试验效果非常好,表明中国的扶贫经验在这些国家是有效的。

从增加就业的情况来看,共建“一带一路”通过投资、贸易、国际产能合作、园区发展等方式,为当地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截至2021年末,纳入中国商务部统计的分布于46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为当地人民提供了39.2万个就业岗位,为东道国缴纳税费66亿美

元。

笔者在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巴西的办公室座谈时，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仅该公司在建设美丽山特高压输电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过程中，就为巴西提供了4.5万个就业岗位，为巴西政府缴纳了15亿雷亚尔税收，还开展了很多社会公益事业。笔者在中白工业园实地调研时了解到，该园区2019年就为当地提供了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笔者在老挝实地调研时发现，在靠近中国边境的磨丁，中国企业家投资建设了一座全新的城市，为当地人民提供了许多就业岗位。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前不久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提出，将“一带一路”打造成惠及各国人民的“幸福路”，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情况。

高质量：新发展阶段的成功探索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更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使“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共建“一带一路”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概括来说，习近平主席从三个维度提出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系统思想，即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这些基本思想与我国新发展理念高度吻合，同时也对共建“一带一路”实践起到重要引领作用。

共建“一带一路”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的国家、行业、产业和项目，需要依靠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来确定跟谁干不跟谁干、干什么不干什么、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一起获得收益。当然，共建“一带一路”是有基本要求的。譬如说，要把绿色作为底色，大力推动绿色基建、绿色投资、绿色金融；共建“一带一路”对所有国家、地区都开放，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所有的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任何形式的腐败，共建廉洁“一带一路”。此外，我国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也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得到了良好体现。总结来说，如果“一带一路”在共建过程中体现了这些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特征，促进了国家发展，增加了人民福祉，那就是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情况来看，到2020年，中国在共建国家建设的能源项目已经以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主。2021年9月，中国更加明确表示，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在巴基斯坦、老挝、阿根廷、克罗地亚等国建设了很多水电站、风电站、太阳能电站，即使是修建铁路也十分重视环境因素。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必然是开放的。一方面，中国欢迎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共建行列；另一方面，经过近年来互联互通建设，中国陆海空货运范围得到了较快拓展。目前，国际道路连通可达19国，国际水路运输航线已达100多国，国际航空货运通航80国，中欧班列连通23国的180座城市。今后，像中老铁路这样的国际铁路线会越来越多，将使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也使像老挝这样的内陆国家不断融入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实现共同发展。

从创新发展来看，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落地应用，为当地的智慧农业、矿业开采、数字经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俄罗斯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开展积极合作；中国与埃及合作开展智能灌溉技术研发，促进埃及沙漠农业发展；中国在非洲国家用科学方法选育良种，提高了粮食产量；中国与葡萄牙共同创建了星海“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等。

此外，中国与相关国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大力推进了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对推进RCEP、欧亚经济联盟、非洲经济一体化等都直接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有助于实现区域与国别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经过近9年的共同努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早已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实践，相关国家和地区已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

8、有一种魅力，叫共建“一带一路”

【来源】《国际商报》(2022-04-08)

【作者】李宁

【正文】今年以来，中国先后与叙利亚、阿根廷、马拉维等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至此，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成员越来越多。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业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合作吸引力不断释放，“朋友圈”越来越大，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

“朋友圈”继续扩大

3月23日，中国与马拉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马外交部长滕博表示，今年是马拉维与中国建交15周年。对于马方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相契合。马方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期待与中方在减贫、农产品出口、基础设施建设、卫生等领域深化合作，造福两国人民，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月初，阿根廷在拉美大国中率先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探讨挖掘双方合作的新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1月12日，中国与叙利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叙利亚计划与国际合作署署长法迪·哈利勒表示，叙利亚的阿勒颇、巴尔米拉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叙利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将增进叙中两国在基础设施、电力等多个领域的友好合作，也将推动叙利亚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

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所长祁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先后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成果文件，已成为各方积极对接的发展平台。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互联互通、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多个领域。

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140多个国家的支持，成为跨大陆的巨型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其以新发展理念为支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全方位系统性的合作，致力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样一个致力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的合作平台上，系统性的合作使得发展效率能够得到保障，发展水平得以不断提升。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发展愿望，有力激发了共建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共建国家畅通自身内外循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和普遍支持，已经从中国倡议通达全球成为共识。”祁欣说。

展现强大韧性与活力

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长0.7%至2.9%。

张建平表示，“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强系统性思维，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合作实际上跨越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子系统，而且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张建平举例说，以贸易为例，其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方式，也是当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经济互补、带动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对外贸易的增长不仅来自贸易本身，更得益于基础设施的联通、营商环境的改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所带来的更高水平的政策性支持，以及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的拉动。

在祁欣看来，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经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逆势上扬，在贸易、投资、工程建设、抗疫合作等方面展现出韧性与活力，弥足珍贵。

数据显示，1-2月，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1.6亿美元，同比增长3.6%，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老挝、塞尔维亚和泰国等国家；贸易方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1.9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

张建平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强大的韧性与活力还体现在，通过合作能够不断挖掘“一带一路”这个大市场的潜力和空间。很多伙伴国家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动力充沛，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各方只有进一步增强互信，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民心相通，才能把潜力更好地挖掘出来。”

9、202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首选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22-04-08)

【作者】郑青亭

【正文】3月31日，中国贸促会发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2021年版）》（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企业对外投资首选地。调查显示，79.5%的企业优先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4%的企业选择欧洲，25.5%的企业选择北美，19.2%的企业选择南美，21.8%的企业选择非洲。

8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我国对外经贸合作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11.6万亿元，创8年来新高，同比增长23.6%，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达29.7%；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384.5亿元，同比增长7.9%，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达14.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何以深受中国企业的青睐？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报告主要撰写人刘英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这些沿线国家不仅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而且跟中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基础，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和很多国家都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使得“一带一路”倡议与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对接起来，这样的政策沟通有利于投资安全。

同时，中国企业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中嗅到了商机。刘英奎指出，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互补性非常强。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而大部分沿线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或是中期阶段。这样的发展差距使得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时具备一定程度的资金、技术、经验优势。

基于迫切的发展需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纷纷向中国企业抛出橄榄枝。刘英奎指出，为了尽快走上发展道路，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来都实施开放性的政策，通过扩大开放积极吸引外资，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相对较少，给中国企业提供了较大的投资空间，不像某些欧美国家对特定产业进行极其严格的外资审查。

超三成企业对RCEP区域投资前景较乐观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22年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强劲反弹，从2020年9290亿美元增至1.6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7%，超过新冠肺炎疫情前水平。其中，中国对外投资表现亮眼，全行业对外直接投

资 9366.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 (折合 145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稳居全球前三。

《报告》显示, 尽管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 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相互影响, 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和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相互交织, 对中国海外投资造成了较大冲击, 但仍有近两成企业对后疫情时代的对外投资, 特别是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区域投资前景较为乐观 (33.84% 的受访企业持乐观态度)。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 RCEP 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成员国在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等多个领域都作出高水平自由化承诺。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 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部分敏感领域都对缔约方开放。同时, 负面清单加国民待遇的 RCEP 外资管理模式, 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加便利地在 RCEP 区域内投资布局, 降低生产成本。

调查显示, 不少受访企业积极申请 RCEP 项下优惠原产地证书, 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关税优惠, 原产地累积规则、“背对背”证明形式将使企业在区域内进行灵活拆分销售和转口, 有助于企业实现精细化分工。某通用设备企业计划在柬埔寨投资 19 亿元通用智能设备项目, 以有效规避轮胎国际贸易壁垒, 提升国际市场占有率, 提高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3 月 25 日,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在线上会议上表示, RCEP 协定的生效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 已成为开发区域经济增长潜力的最大抓手。RCEP 协定内容丰富, 其中关键内容是减免关税。两个多月来, RCEP 成员国企业和区域外的许多企业看好 RCEP 区域贸易投资活力, 正在实施抓住新机遇的行动。

据中国海关统计, 今年 1-2 月, 中国对与 RCEP 其他成员国贸易达 1.85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 9.5%。其中, 中国与马来西亚贸易额 294.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1%; 中国与泰国贸易额 203.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6.3%; 中国与印尼贸易额 219.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9.1%; 中国与新加坡贸易额 142.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 中国与菲律宾贸易额 112.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7.6%。

企业最担心疫情影响持续和投资回报率下降

在国外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行为上升的背景下, 中国对外投资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报告》显示, 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最担心遇到的非商业性困难与挑战是疫情影响仍在持续 (87.6%); 商业性困难与挑战是投资回报率下降 (52.2%), 较上年扩大 2.1 个百分点。44.8% 的企业表示其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在人、财、物安全风险, 较上年扩大 4.5 个百分点。

刘英奎指出, 当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确实较多, 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法律法规风险、文化风险、环境保护风险。近两年来, 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人流、物流受阻, 增加了项目运转的困难; 二是各国经济遭受疫情重创, 购买力大幅缩水, 物流费用不断上涨, 市场风险加大; 三是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加大, 增加了在海外市场的投资风险。

3 月 31 日,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于毅答记者问时表示,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着不少风险和挑战,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企业反映投资所在地营商环境问题。例如, 部分国家政治不稳定、社会治安状况较差, 对中资企业人员、财产安全造成较大影响; 部分国家政府行政效率较低、税制复杂, 对投资资金安全回收和投资者信心造成较大影响; 部分国家道路、电力、用水等配套设施不完善, 对中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影响。

二是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有关的风险挑战。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增加, 联合国贸发会议 2021 年 6 月底发布的《2021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全球新制定的投资政策中, 限制性政策占比从 2019 年的 24% 上升到 2020 年的 41%, 受访企业普遍认为, 美国和欧盟是对外投资安全

审查和限制最多的国家和地区。

三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各国的疫情管控措施、医疗卫生水平、疫苗接种情况不一样，导致企业海外疫情防控难度大、企业海外项目正常运转受影响、企业人员流动受限等方面。

超三成企业在东道国遇到过合规问题

合规经营是企业适应海外市场需求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已成为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报告》显示，32.8%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及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过合规问题，较上年回落3.4个百分点，遭遇的主要合规问题依次是：市场准入限制（57.4%）、劳工权利保护（48.1%）、税务审查（45.0%）、环境保护（41.1%）、外汇管制（40.3%）。

刘英奎指出，近年来，在推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从政府到行业协会再到企业，中国对合规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合规建设能力已经得到极大提高。但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这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进一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

在刘英奎看来，虽然东道国普遍对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并且缺乏合适的环保设备和技术水平，再加上受限于经济实力，使得本国的采矿业和化工业污染极其严重，这客观上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环保风险。

同时，他指出，对于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有些国家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可能持有不同的态度，它们在权力博弈过程中往往拿中国企业说事。此外，有些外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会采用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比如以所谓的“环保问题”抹黑中国企业。

“总体来讲，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环保意识在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会主动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尽量做到合规。此外，中国企业也在不断提升环保技术水平，包括增添新的设备、制定环保方案等。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的环境保护会做得越来越好。”刘英奎说。

10、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协同增效

【来源】爱思想网(2022-04-20)

【作者】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陈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正文】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大公共产品。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各国民心所向。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2021年全球发展倡议，中国为破解发展难题、解决发展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推动国际发展到全球发展新转变

当前，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全球发展问题的“多发地”，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面临严峻挑战。世界银行2022年《全球经济展望》指出，发展中国家“硬着陆”风险上升。不仅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远未解决，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因疫返贫、因疫生乱，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增加了全球发展赤字的复杂性。在现有发展框架下，南北合作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不及承诺数额的一半，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还远远落后于全球步伐。

不仅发展中国家原有发展进程停滞倒退,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新的发展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社会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遭受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2021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020年,全球有7.2亿至8.11亿人面临饥饿,比2019年增加了约1.61亿人,数据表明,在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未在既定轨道之上”。世界经济疫后复苏步履维艰,部分发达国家通胀水平上升至多年高位,美欧加息给全球经济带来滞胀挑战。发达国家中也有不少民众生活陷入困境,社会问题频发。乌克兰局势持续动荡对欧元区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不断走高,全球供应链紊乱加剧。南北各方对于全球发展赤字仍存在认知赤字,割裂的全球意识成为制约全球发展合作的主要障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叠加呼唤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根据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疫情造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17个目标进度放缓,部分领域甚至出现倒退,人类发展指数三十年来首次下降。过去的国际发展机制仍以西方为重心,少数发达国家把持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充分展现了中国重视共同发展、推动实现全球发展的坚定决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方案:全球发展与“一带一路”双倡议齐发力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为全球提供的双方方案,把促进共同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形成了新发力点和新结合点。可以看到,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维度内容高度契合、进程相互对接、平台相互促进,契合了各自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符合全球发展规律,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国际倡议,为新时代发展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根本遵循。

在合作理念上,“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等作为理念创新,为新时代发展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根本遵循。2030年议程是全球193个国家的谈判共识,充分表达了世界各国的关心关切,为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下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提供了共同的话语体系。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最核心理念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中国的理念与世界的需求相结合。1994年,中国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第一个发布了本国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中国21世纪议程》。进入21世纪,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急他国之所急、想他国之所想的共情之心没有改变。全球发展倡议核心是推动共同发展,以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六个坚持”为内涵,以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重点领域上,2030年议程17项目标与“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高度契合,全球发展倡议与2020年联合国“行动十年”规划彼此呼应,聚焦减贫脱贫、粮食安全、经济复苏、教育卫生等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提供“21世纪的解决方案”。围绕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如何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双倡议在重点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通过发挥“一带一路”倡议重要作用,重点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合作建设一项项大手笔重点工程和一个个“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项目,与全球发展倡议一道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不断增强当地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预测,到2030年,“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帮助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为全球发展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在议程设置上,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南南合作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中国将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在重点专项规划中予以明确和细

化,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有效对接。大力开展新时代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合作平台。另一方面,中国与国际和地区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系统携手合作,《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谅解备忘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等文件已经转化为务实行动,中国还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战略协作,同小岛屿、内陆、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进程协同。中国已经同世界2/3的国家和1/3的主要国际组织形成了“一带一路”共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启动标志着倡议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一步。

中国智慧: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

全球发展议程已经进入倒计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必须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属于世界,把握全球发展脉搏和迫切需求,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旺盛活力。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进一步实现相互促进、协同增效,需要从三个维度推动落实。

一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释放南南合作潜力。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尊重发展中国家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遵循务实合作的行动指南,把握数字经济、疫苗合作、互联互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发展机遇,开展联合自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要求发达国家言行一致,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探索新经济形态和新发展模式,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和社会恢复与发展。

二是联合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南北发展鸿沟。2015年7月1日,中国成为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成员。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称之为“互惠互利、知识共享的历史性变革机遇”。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发挥了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G20扮演桥梁和纽带作用。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主张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动力。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复苏采取的措施和国际发展承诺将决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发展道路,直接影响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敦促发达国家落实发展援助承诺,实施负责任宏观经济政策,遏制高通胀向全球蔓延,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共同反对任何国家和个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反驳西方对我遏制打压、攻击抹黑的同时,推动南北合作和三方合作。

三是加强和发挥联合国作用,践行多边主义。继续推动联合国将发展置于议程核心位置,将践行多边主义贯穿在国际发展合作的各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反对意识形态划线和发展问题政治化。坚持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继续坚持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国际发展合作格局,在多边发展框架下推动和引领全球发展合作的话语体系建设、知识构建、范式研究。推动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专家智库、媒体等积极参与落实2030年议程。

总之,通过对发展问题“再聚焦”、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再承诺”、对全球伙伴关系“再提振”、对国际发展合作“再激活”,中国为缩小南北鸿沟、破解发展不平衡提出了“路线图”,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加速器”,为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强大合力。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1、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来源】爱思想网(2022-04-15)

【作者】丁工(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正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互帮互助,强化了中阿之间的合作精神和团结意识。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有力地维持了国际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完整,保障支援阿拉伯国家的抗疫物资运输畅通,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疫情对阿拉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借助本次联手抗疫进一步夯实双边合作基础的有利契机,推动构建中阿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和“健康丝绸之路”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未来,中阿要以产能合作、互联互通为平台和抓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中阿合作论坛的内涵和范围,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力量、作出新贡献。

阿拉伯国家历史上就是丝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能源资源,目前面临着推升本国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任务,自然成为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环节。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地区内就有许多最早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阿拉伯国家。从目前来看,与中国商签了“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的阿拉伯国家不断增多,多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阿盟负责人也积极参与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中阿日益形成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因此,中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从以下方面用力。

第一,能源合作是中阿经贸关系发展的亮点和主线。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中东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转向能源领域,能源成为中国在中东最大的利益。1994年,中东石油就占到中国全部石油进口的40%,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推动了与阿拉伯世界贸易成倍增长。在能源贸易的带动下,中国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能源进口的单向道,转变为能源进口、工业品出口的双向道。当前,部分阿拉伯国家也意识到了过度依赖油气资源的短板和缺陷,正在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通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成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增强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改变传统依靠化石能源的单一经济发展格局。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有能力和意愿帮助阿拉伯国家摆脱过度依赖能源的单一发展模式。

因此,中阿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继续深化以能源和贸易投资为主轴的务实合作,强化能源开采、加工、集输和储运等领域的专业合作,进一步推动阿拉伯国家油气衍生品本地加工和凝聚产业链条的协同合力。同时,在双方以能源为主体的经贸合作中,中国不是利用资金、技术和产能优势单向度换取外部资源和市场,而是要积极承担起阿拉伯国家经济技术引进的可靠角色,帮助阿拉伯国家在立足能源产业的基础上孵化和培育新型业态。阿拉伯国家能源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带动更多优质投资,集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资本,并随之产生巨大经济效益。这又可以反向促进中阿贸易方式和结构双重优化,形成能源产业“补链”“强链”牵引贸易投资,贸易投资创造和催生能源合作新业态、新模式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局面,进而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层级提升至高质量水平。

第二,加强互联互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的血脉经络,不但有助于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和地理环境的阻隔,还能够推动不同领域技术的跨界融合和集成创新,促使各国先前积蓄的潜能被充分激发和释放出来。互联互通对中阿共建“一带一路”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是“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基础前提。基础设施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先导要素,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国计民生保障具有强大的拉动和促进作用,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客观来看,基础设施长期以来都是阿拉伯国家经济建设的薄弱环节,已经成为制约阿拉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和技術积累,已经建立起全方位的基建产业链,能够为各种基建项目提供全流程的工程总承包服务,日益成为对外承包工程大国,中国相关企业的经营服务质量和行政管理水平整体已经处于全球先进行列。因此,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设计咨询、装备制造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加上阿拉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运不足、需求旺盛,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认可和行动,为双方互补合作创造了重要空间。由于阿拉伯国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决定设施联通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中国在推动基础设施合作时,既以双方沿海重点港口为节点打造海上互联互通网络体系,充分发挥海运这一主要运输渠道的效力,强化海上联通和国际海洋合作;又要充分运用内陆国的区位优势,加快物流配送中心建设,推动铁路、海港、内河航运和国际机场等项目的综合联通,真正实现公铁空港无缝对接。同时,要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各个项目单元平面化、单线条的串联,而是需要统筹推进能源管廊、海底电缆、通信光纤、电力网络与公路、桥梁、隧道、港口码头等的协同联动建设,形成覆盖运输物流、信息通信、商业开发、市政设施和公用工程等不同境域维度的综合交通网格体系,构建起多元化、全方位、复合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格局。

疫情之下,“健康丝绸之路”的理念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沟通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也让世界各国看到“丝绸之路”不仅仅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去经济发展的机遇,还关注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随着全球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阶段,中阿之间将继续沿着控疫情和保经济“两轮并行”的思路,积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践行路径,既推动“健康丝路”建设,又促进“繁荣丝路”发展,不断增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彼此信任和传统友谊,推动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实现高位跃升,也为后疫情时代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增添新内涵、注入新动能。

12、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

【来源】爱思想网(2022-04-15)

【作者】李佐军,田惠敏

【正文】八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共建“一带一路”为伙伴国家开展贸易和投资搭建了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也助推了中国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协同开放,为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动力。今年2月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提出,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合,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这对于新时代优化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发挥战略协同耦合效应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根基在于国内的发展,重点在于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紧密。我国已成为25个沿线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据统计,2013年-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从6.46万亿元增长至11.6万亿元,年均增长7.5%。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已超1000亿美元。截至2021年末,我国已与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我国区域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更为紧密,区域之间的资源互补和区域协调发展向好趋势明显——不断深化了向东开放,扩大了向西开放,全方位主动开放格局逐步呈现,经济发展内在潜力得到释放。如,东部地区将优势资源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样,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得到一定程度开发,并通过扩大对外招商引资,在活跃中西部经济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部经济

的发展。再如,长三角地区在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利用自身政策、经济和地理方面的优势,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境外经济合作园区及“中欧班列”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建设与部分国内重大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合不足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战略实施属于跨省际行政区域层面,战略区域内部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协调性还存在统筹性不足问题,不同战略之间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仍存在政策统筹衔接不畅、政策交叉重复、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性政策冲突、政策实施层面不配套、不协调等问题。为此,需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协调的发展问题。一是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顶层设计与各地方、各区域具体实施规划和方案的对接,明确相关省市和区域战略的功能定位和分工,形成上下互动、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二是“一带一路”是更为顶层的和管总的战略,国内各重大区域战略实施必须服从“一带一路”倡议的顶层设计,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必要支撑。要围绕“一带一路”陆上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重大战略通道及支点建设,未来国内区域发展战略应更加重视国内区域与国际区域的有机衔接。应充分发挥贯通南北方、横跨东中西、连接国内外的重大轴带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三是要采用行政区与类型区相结合,制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比“四大板块”更加精细化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指导下,在“四大板块”的基础上细化政策制定单元,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总体目标,尽快调整和细化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四是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内区域发展策略的有机衔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执行,提升沿海、内陆、沿边对外开放空间规划。协调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机对接,为“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提供绿色协同发展样板和流域高质量发展路径方式。五是提升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重视沿海发达地区转型升级,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提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及其所直接影响的经济区域来构建应对全球竞争的国家竞争力,应成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流成果

一、学者成果

1、时空变迁与复合结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二期)

【作者】马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唐贤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正文】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角色正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一个讨论和争论热点。但专门研究中国角色的文献还非常少,相关讨论分散在对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研究文献中。而且,很多研究在解读领导人讲话精神、介绍相关政策文本和背景的同时,缺乏对“中国角色”进行学理分析,研究的概念化程度偏低、同质化程度较高。基于中国在当前的全球抗疫和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表现,人们不难看到中国角色的多样性内容。中国是抗疫的理念倡导者,引领着全球卫生健康的治理进程。中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积极提供者和援助者,践行着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一家”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国积极主张多边主义治理

框架,全力支持联合国及其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工作,维护其领导权威,因而是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支持者和规则的遵守者。中国也对现有治理体系的结构局限发表了改革和完善的建议,主张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来变革治理体系,因此中国又扮演着合作者和合作推进者的角色。这些共时性角色内容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由几个不同视角所构成的解释框架,来分析中国角色及其变化。我们把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角色分为历时性、空间性和共时性三个方面的结构。这个角色结构的类型学主要是描述性的,它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为主线。研究的目的在于为认识和进一步分析中国角色和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某些坐标或方位。

一、中国角色的历时性结构及其变迁

(一)“分水岭”与时间维度的含义

从时间维度来审视中国角色及其历时性变迁很有必要。今天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历史形成的。中国角色是中国自身成长以及“健康中国”建设的结果。国内卫生健康治理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在这一构建行动中能够发挥其特殊作用的基础。同时,在中国与世界体系互动的不同阶段,中国角色有着不同的内容。一般认为,中国寻求参与并积极融入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体系,2003年的SARS危机是一个“分水岭”¹。这一危机暴露了当时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及其危机应对能力的诸多问题,同时也促使人们认识到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卫生健康治理的国际合作是战胜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有研究者指出,SARS事件对于中国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建、对于中国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都是“一个重要的契机”²。

分水岭之后的制度变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仅仅从这个分水岭出发去描述和审视中国角色还不够客观。有研究者把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看作是一个从“后来者”“融入者”到“支持者”的重大转型的过程³,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叙述忽视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若以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程度”为视角来检视,那么,中国角色的历时性结构应该包括“分水岭”之前的中国实践。这样,中国就既不是一个“后来者”,从一开始到现在也不是一个挑战者,而始终是一个支持者。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中国角色的历时性结构经历了制度创始者、体系外的有限参与者、体系内的低度参与者、积极的融入者和体系的建设者五个方面的转变。

(二)制度的创始者

“制度创始者”(creator)角色的事实依据是,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WHO的重要发起国之一。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时并没有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卫生机构的议题,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也无任何关于卫生工作的内容。正是中国代表会同巴西代表提交了“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才为创建世界卫生组织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由于国际关系方面的原因,中国长时间里被排斥在联合国体系之外⁴,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是制度创始者角色。中国不是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后来者”,相反,从一开始,中国便是一个制度的建构者。

(三)体系外的有限参与

由于曾被排斥在联合国体系之外,中国此前与国际社会之间只存在有限的、低度的互动,中国只能做一个体系外的“有限参与者”。这并不妨碍中国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一个事实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医疗下乡”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农村卫生事业建设作为一场成功的“卫生革命”⁵,曾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发展中国家卫生工作的典范⁶。当时亚非拉和欧洲很多国家的代表团前来中国参观和考察“赤脚医生”的制度和经验,并给予高度评价⁷。另一个事实是,中国很早便开启了对外卫生发展援助工作。早在1963年,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请求,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并确定了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长期战略⁸。此后到1976年,中国先后与20多个非洲国家签订

了关于派遣中国医疗队赴对方工作的议定书。对外医疗援助既包括派遣医疗队,还包括提供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帮助受援国建设医疗基础设施,培训医疗人员。

(四)体系内的有限参与

随着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开始了与国际组织间的积极互动。1972年5月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WHO合法席位的决议。这为中国参与多边领域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了制度性条件。在体系内的最初5年里,中国参与多边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出席WHO的行政例会,很少有实质性的合作。在第二十六届(1973年)和第二十七届(1974年)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代表都向国际社会介绍了“赤脚医生”的工作经验。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来华考察,吸收借鉴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卫生运动实践经验,这为1978年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阿拉木图宣言》中正式提出的“初级卫生保健”概念和倡导的“人人享有健康”奠定了基础。实质性多边卫生合作真正开始,始于1978年10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技术合作的备忘录》。从此,双方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在该多边组织中的作用也日益提升,比如,中国开始主动发起一些决议案。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在国际体系之外和成为国际体系正式成员的早期阶段,中国便是全球卫生治理的“参与者”,而不是所谓的“后来者”。只是那些时期里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较低,这是由历史造成的结果。

(五)积极融入

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以来的几十年,是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扮演全新角色的时期。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程度(或中国的参与度)为坐标,大致包括改革开放后至2012年和2012年以来至今两个阶段。相应地,中国角色的历时性结构呈现出“积极的融入者”和“体系的建设者”两个特征。从国际制度的建构和运行逻辑来说,行为体只有融入了体系才有机会成为体系的建设者。总体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还尚未结束,但2012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作用与贡献越来越大。因此,区分这两个角色,一是基于时间逻辑(互动程度和融入深度的先后变化),二是基于行为逻辑(发挥建设和建构作用日益明显)。

作为一个融入者,中国以多样性的方式参与了全球卫生治理。一是合作的内容和领域越来越广泛。自恢复在WHO中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卫生服务与卫生体系、食品和药品监管、环境卫生、传染病、妇幼卫生保健、人员培训、重要会议的举办等领域不断深化与WHO的合作。二是融入的平台越来越多。除WHO外,中国与联合国体系下的其他国际组织也建立和深化了卫生合作关系,包括世界银行(198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8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1978年)等。中国与这些机构就农村卫生、公共卫生与服务体系、卫生人力资源开发、传染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保健、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艾滋病预防与控制、疫苗、儿童早期发展和保护、医学教育等项目进行广泛合作。通过这些合作项目,中国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还获得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三是积极发展与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国际机构(尤其是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中国除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还与欧洲联盟(1998年)在食品安全、职业卫生、结核病、艾滋病、卫生系统发展等项目上展开合作,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2002年)就疫苗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开展合作项目,努力争取全球基金(2003年开始)对我国控制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的巨额支持。四是公共卫生健康问题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议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是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体系的一个重要例证。2001年5月的联合国大会关于艾滋病的会议,中国只派出了时任卫生部长为首的一个代表团,这与派出更高级别政治代表与会的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但自2003年中国与WHO合作共同应对和解决SARS危机之后,这种情形得到了改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代表团参加了当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公共卫生问题从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优先议题9。

(六)体系的建设者

在经过三十多年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之后,中国目前正以一个积极建设者角色出现在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尽管中国要更好地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变革还存在着多方面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积累全球卫生外交实战经验、熟悉与掌握国际议程规则、提高卫生外交事务的参与度¹⁰,但中国自2012年以来作为一个治理体系的“建设者”角色确实越来越显现并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作为“建设者”角色的形成是前四个角色发展、演变和积累的自然结果,是改革开放以来“积极的融入者”角色的进一步延伸。事实上,在积极融入者的角色阶段,中国便适时地重新定位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即“负责任的大国”¹¹。中国希望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与树立,以期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和国际体系成为“建设性合作者”,并为国际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¹²。体系建设者的角色所描述和涵盖的是21世纪初(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最近叙事,因此,我们把这一角色的要素和内容放在中国角色的共时性结构中来描述和分析。

二、多样性的行动舞台及其变迁

历时性结构解释了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角色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大体符合中国与以联合国为主要代表的各主要国际组织之间关系的变化逻辑¹³。推动中国角色发生变化的力量,既有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压力和塑造下的自觉自我调整(即政策学习),也有中国影响、改造、修正国际体制的正反馈。从历时性结构的变迁中可以看到中国角色的行动舞台存在的差异和变化。因而需要从空间的维度来进一步考察中国角色的变化。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考察是理解中国角色的共时性结构的基础。

(一)国内卫生健康治理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在国内-国际两个空间里同时致力于推进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中国在与国际社会已经处于高度相互依赖和深度互动关系的情形下,其国内的卫生健康治理已然成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治理及其成绩是中国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所做出的贡献,也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不能像那些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文献那样只把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外部行动,忽视中国自身的国内建设。

中国角色历时性结构表明,中国国内的卫生状况和健康水平的改善与提高,对全球健康状况与健康水平的提高从来都是举足轻重的。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极大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有效性。这方面的政策(文本和行动)很多。2008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了卫生改革和健康促进战略。“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制定和部署驱动了中国的卫生健康治理越来越符合国际卫生发展的规律。2016年发布与启动实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明确界定为核心目标,并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路线图和施工图。同时,中国切实落实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就议程中的卫生问题,中国政府积极履行公共健康治理的主体责任,成立了由多个部门参与的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调机制。

当前中国和国际社会应对“COVID-19”疫情的行动,生动地说明了从国内-国际两个空间的互动视角来解释中国角色的重要性。中国抗疫是在“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同作战”¹⁴,而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抗疫战斗是在国内-国际两个战场上展开的,肩负大国担当,与各国并肩作战。中国国内的抗疫行动助推着全球卫生治理¹⁵。

(二)双边外交

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特点的双边外交,一直以来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最重要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外交舞台逐渐向以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相结合的模式转型。长

期以来,中国双边性的公共卫生外交主要集中在中美和中非两个空间⁹。中非双边卫生外交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¹⁶,构成了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的重要部分”¹⁷。随着卫生健康领域的多边合作行动的推进,很多双边性的合作与援助项目是在中国支持和参与以WHO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卫生健康多边治理体系的框架下进行的。比如,中国以研制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药物和疫苗等方式积极向有关非洲国家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的双边行动,就是通过这一框架进行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双边卫生健康外交的空间不断被拓宽到传统的非洲地区之外的更多地方,形成了范围更广的“健康丝路”。在继承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对外卫生援助与合作的成功案例和经验的基础上,“健康丝路”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卫生外交也出现了新的变化。SARS危机之后,中美两国的卫生合作出现了多领域、多层次和多渠道的良好态势。其中,关于传染病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2005)和关于医学及公共卫生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议定书”(2008),为深化两国间的卫生健康合作建构了良性的管道。但是,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期间,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造成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紧张关系,并对当前两国甚至国际社会的抗疫行动产生了严重影响。即便如此,中国依然基于全球抗疫大局的考虑而努力推进着中美之间的卫生健康合作。中国与欧洲国家和欧盟之间的卫生健康双边外交,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三) 多边国际组织

参与多边组织的数量、广度和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外交能力和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在21世纪之前,中国由一个几乎完全孤立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国家转向了参加约80%以上的国际组织。就卫生健康治理领域而言,WHO是中国唯一主动并成功建立合作关系的多边国际卫生机构。在中国重新成为WHO的合法会员国之后,中国的卫生健康治理受到该国际机构的肯定。1991年WHO授予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以最高荣誉奖(“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金质奖章),使之成为全球范围内被授予此奖的第一位国家卫生部长。SARS危机爆发后,中国不仅把公共卫生问题提升为外交政策的一个焦点议题,而且开启了与WHO广泛和深入合作的进程。其中,中国首次提名的候选人陈冯富珍于2006年11月成功当选为WHO总干事,这是中国开展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外交的一个重大成果。习近平于2017年1月17日对WHO的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WHO的访问,向外界传递了中国对全球卫生事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和重视的信号,中国与WHO的合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与陈冯富珍共同见证了中国与WHO签署“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文件,习近平称赞中国与WHO的合作“堪称典范”¹⁸。

除了参与WHO主导和引领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框架外,中国的多边舞台还越来越多样化。诸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这样的跨区域多边机制,中国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区域性多边机制(比如金砖国家集团、东盟-中日韩卫生合作机制、大湄公河次区域、上海合作组织、中亚经济合作等),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形式的重要国际机制,都是中国可以进行深入的公共卫生健康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的多边舞台。随着G8重要性的相对下降以及G20地位的相对上升,中国在G20框架里能够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习近平在G20领导人特别峰会(2020)的发言所发出的全球合作抗疫和共同帮助公共卫生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的倡议¹⁹,对于如何形成全球合作抗疫特别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承诺和政策一致,而中国在这些多边舞台上的行动和声音,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有建设性意义的。

(四)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倡议,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一个新的重要的平台。目前,一个全方位、跨领域的“一带一路”卫生合作战略布局已经初步形成²⁰。“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是中国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扮演积极的建

设者角色的良好舞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提出要推动国际社会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以期形成多边的公共卫生健康治理图景。这就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支点。根据《“一带一路”卫生合作暨“健康丝路”北京公报》(2017年)所描绘的共建“健康丝路”路线图,中国将致力于建立“一带一路”卫生政策研究网络、公共卫生合作网络、医院联盟和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联盟,对“一带一路”国家实施妇幼健康工程,并规划加强卫生人力资源的互动。这对于中国创新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增强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提升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至关重要²¹。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健康丝路”建设表明“中国在巩固其作为全球卫生政策主要参与者的作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²²,它本身可以被视为中国为全球卫生合作所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作为一个行动舞台的“一带一路”,与上述其他舞台是交叠的、互动的。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通过WHO的框架进行。“健康丝路”由中国携手沿线国家和WHO等多边平台共同打造,有了这种以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的创新合作模式,中国得以与沿线国家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务实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将得到全面提升。

三、中国角色共时性结构的复合性特征

对中国角色的共时性结构的考察,主要以2012年以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实践为样本和叙事对象,兼顾2003年至2012年的角色和行动。中国角色的共时性结构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复合性,即多重角色建构了中国作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建设者”身份。在国际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建设者角色存在着严重的猜疑、误解甚至曲解。

(一)建设者角色的提出和含义

中国以建设者身份活跃于全球治理中,是基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体系及其结构性局限的认识。从埃博拉疫情到COVID-19疫情,对人类的卫生健康构成极大危害的各种危机,让人们看到卫生与安全这两个议题的边界逐渐消失了——卫生健康危机越来越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但既有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体制在有效应对和治理上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21世纪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呼吁要建设一个更为完善和有效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变革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中国认识到通过与全球合作能够在这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2013年中国举行了援非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召开的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演讲中强调,中国要更为开放地参与全球合作,加强全球层面的协调,尤其是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²³。在2021年的全球健康峰会上,习近平就全球抗疫合作所提出的五点“中国主张”中,就表达了“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治理体系”的意见²⁴。作为一个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体系的积极建设者,中国提出了先进和深刻的治理理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并在国内治理和国际合作治理中积累了科学的经验。但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体系与机制,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落差和张力。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先进理念,以及变革和完善治理体系的愿望和主张,符合良好的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后面几个具体的角色集中解释了中国“建设者”角色的内涵: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机制的完善者,而不是破坏者;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促进者,而不是不稳定和威胁的制造者。较长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分析家就中国的参与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认为中国在扩大国际组织的参与度的过程中,中国较之其他国家在制度内的行为并不出格,一旦进入国际制度,中国并未试图挑战这些国际制度的基本目标²⁵。

(二)引领者

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先进理念对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方向起着引领作用。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2017年先后被写入了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领域的延伸,是中国面对疫情大考为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中国的倡议者和引领者角色主要体现在:第一,坚持全球化。在疫情面前,西方一些国家基于狭

隘的自身利益考虑而采取了各种反全球化政策。中国则希望通过这一理念的倡导和实践来推进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非常清楚,当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²⁶。第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维护和保障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及其领导人多次向国际社会呼吁“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佑护地球家园和人民生命健康²⁷。践行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国际社会必须走团结合作的道路。加强国际社会的互助与合作,是战胜疫情、维护安全、促进健康的最有力武器²⁸。第三,坚持多边主义。中国提出了引领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方向的理念,但中国不试图扮演领导者角色。中国方案和主张所强调的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须走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之路。长期以来(尤其是当前)中国始终强调要“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²⁹,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权威。

(三)推动者

中国在积极推动国际治理领导力的重塑。全球公共卫生方面的危机“并不是疾病的危机,而是一种治理危机”³⁰,而WHO因制度性困境、民主赤字困境以及财政困境等因素而造成的领导力下降³¹,加剧了这种治理危机,以至于被很多人批评为“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变得无关紧要”³²。面对当前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无序的多元化”³³,以及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WHO的领导权威又不断被一些国家指责和削弱的局面,中国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和WHO的领导地位。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先后两次向WHO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捐助以支持WHO更加有效地发挥全球抗疫领导作用。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宣布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2021年5月21日的全球健康峰会上,习近平代表中国再次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表态和支持有利于引导世界加大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WHO的支持,也表明中国是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的维护者。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制度的治理能力建设。自2003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公共卫生安全的动议。第58届联大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中国提交的《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决议草案。得到156个国家联署的该草案,核心内容是要通过国际合作将国家和全球的卫生议题纳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中。在联合国和WHO的推动下,卫生健康问题在2003年后被置于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地位,2019年联合国大会相关高级别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健康全覆盖政治宣言》巩固了这个发展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直与WHO紧密合作,积极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通过双边和多边平台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合作。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有关治理制度的修正和完善以提高国际制度的治理能力。《国际卫生条例》(1969)在预防和应对各类公共卫生威胁和突发事件上只强调对边界地区的控制,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为此,中国与WHO的其他成员国积极磋商,通力合作,就相关条款的修改达成了共识,从而形成了《国际卫生条例》(2005)这个新的全球治理规范框架。中国在当年就迅速批准了这个新条例。中国政府批准该条例意味着中国“接通了融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桥梁”³⁴。

(四)合作者

中国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程中的合作者和合作促进者。从历史到现在,中国的卫生健康“国际发展合作”包括全力支持WHO、艾滋病规划署等联合国机构的工作,维护这些多边机构的领导权威和地位,也具体包括派遣医疗队、建设医院、设立疟疾防治中心、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药品和医疗物资,以及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等全球卫生新倡议。中国的倡议、政策和行动,始终秉承人民健康至上、促进人类健康福祉的“天下一家”合作理念,它寻求“达则兼济天下”,努力做好自己,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惠及他人。信奉权力政治和霸权政治的西方国家理解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观和中国文化基因中特

有的情怀,因而对中国的猜疑甚至无端攻击不断。2019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全面回顾了70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健康合作、构建伙伴关系、探索卫生发展援助模式的历程和成就³⁵。在当前的全球抗疫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多次重申:“我们愿同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一道,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贡献。”²⁸中国所倡导和主张的国际合作是多层次、多面向、多方位的。由中国等国在2006年初倡议国际社会而成立的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国际联盟(IANPHI),一直在致力于通过技术合作、专家资源共享、政策倡导等活动来促进各国公共卫生机构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当前的抗疫斗争中,中国一直积极呼吁和推动在疫情溯源、药物和疫苗研发、检测等方面的科研攻关合作,以实现科研数据、信息和专家资源的共享。

(五)供给者

历史地看,中国自身卫生健康治理能力的提高得益于大量的国际合作项目³⁶,因此,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曾是国际合作行动中的“受援国”或“被治理者”。但共时性角色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中国一直同时在积极扮演“援助者”和“治理者”角色。中国当前正以一个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和这种供给中关键的合作推进者身份出现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卫生健康问题上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利用不充分和供应短缺两种情形³⁷。从当前的疫情来看,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公是最大的制度性难题。联合国早在制定《联合国千年宣言》的实施工进图时就发出警告,世界上许多卫生健康需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才能得到满足。全球卫生公共物品的内容包括健康威胁监测、健康产品研发、知识产权共享、市场塑造等方面。而这些方面的生产(供给)和分配(管理)都依赖于足够的资金和有效的制度。

自2015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年度筹资大会上中国承诺捐款500万美元、从而变成该联盟的出资国以来,中国对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财政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在WHO的双年度规划预算中,中国缴纳的评定会费在2018—2019年度中已跃升为第三名,占7.92%的份额,而到2020—2021年度,中国的份额上升到12%,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而居全球第二位。在信息共享、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与使用等方面,中国也一再主张要实现科研领域的通力合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习近平呼吁“要集各国之力,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力争早日取得惠及全人类的突破性成果”,并承诺中国将努力让新冠肺炎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¹⁹。不同于一些国家的口惠而实不至,中国讲话向来就算数。自中国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以来,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疫苗已惠及数亿人口。作为一个良好履约者、积极行动者和体系建设者,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携手国际社会合作推动供给模式的转变,以避免霸权供给和单边主义供给的局限性。中国的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综合了国际规则、中国经验和对象国的需求等多重考量,初步形成了以WHO多边框架为基础、以区域和跨区域机制为补充、以双边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供给模式³⁸。

四、结论与余论

通过对历时性结构、空间结构和共时性结构的讨论,关于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形成以下几个重要结论。首先,目前形成(中)的共时性角色结构,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可以割断这个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尽管中国在参与过程的不同阶段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水平存在着差异。其次,在历时性和共时性角色结构中,中国在不同的行动舞台上扮演着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我们必须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认识中国的角色,而不能把中国的作用在空间上进行国内-国际的分割。“区分国内健康问题和国际健康问题正在失去其意义,并且常常会产生误导。”³⁹再次,我们不能从中国角色的历时性结构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中国角色正在从历时性结构中的某个角色向某个共时性结构角色转变。若说角色转变,可能最恰当的一个表述是,在参与全球卫生健康的治理进程中,中国的积极

程度、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水平、所发挥的建设性功能等方面总体上越来越大,因此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复合型的角色结构,而不是某些单一类型的角色。

本文建构的分析中国角色及其变迁的类型学,依然是初步的,尚有大量问题有待进一步展开与讨论。一个较为重大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动力驱使着中国角色的历时性、空间性和共时性角色结构的变化?学界虽然普遍肯定中国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之间积极互动的重要性,但是,对中国角色“是什么”以及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还存在着诸多争议⁴⁰。每一种角色涉及到角色期待(自我期待和他人期待)、角色行为选择、角色绩效等问题,因此,对动机或动力问题的探讨十分必要。另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某种角色是单一性的还是可以再深入细分为某些角色亚类型?比如合作者角色,在中国的对外卫生援助、卫生发展合作等行动中,有些行为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义务的考虑,而有些行动和项目,则是基于互利互惠的合作,就如中国一直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主张。因此,合作的类型也是多样化的,这一点在中国倡议的“健康丝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角色才可期得到更好的理解。

学术前沿

一、智库报告

1、中国 OFDI、空间溢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来源】《经济经纬》(2022年第2期)

【作者】王晖,仲鑫

【关键词】中国 OFDI; 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 空间溢出; 高质量发展

【摘要】为从空间关联视角厘清中国 OFDI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2006—2017 年 52 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中国 OFDI 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 OFDI 有利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技术转移型 OFDI 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效应最大,资本转移型 OFDI 次之,劳动转移型 OFDI 最小;劳动转移型 OFDI 促进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技术转移型 OFDI 次之,资本转移型 OFDI 最小,并且无论是中国整体还是不同转移类型 OFDI 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强于其直接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区域沿线国家中,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中国 OFDI 促进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最大,促进其他亚洲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次之,促进欧洲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最小。

2、“一带一路”国家设施联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22年第3期)

【作者】刘春艳; 赵军; 徐俊

【关键词】“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联通;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 投资潜力

【摘要】以基础设施为内容的“硬联通”是推动“一带一路”国家携手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主要领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从“走出去”向“走上去”转型的关键时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需要锚定方向。基于“一带一路”3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时变随机前沿模型与马尔科夫链,分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效率提高及潜力拓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的通信、能源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联通水平提升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而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水平提升暂未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均值逐年攀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攀升趋势更为明显;但效率值较低,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且各国间的差距在扩大,存在马太效应;现阶段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表现为开拓型与巨大型,存在长期增长空间。因此,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设施联通建设方面的合作,引导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进行投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运转规模与效率,有助于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惠共赢。

3、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程中的环境效应分析——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作者】方恺,许安琪,何坚坚,王思汭,张旭亮

【关键词】“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足迹;多区域投入产出;空间计量

【摘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精准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SDGs的实现进程对区域环境足迹的影响,可为加快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土地、碳、氮、磷足迹的总量和人均量均呈先增长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全球供应链中是虚拟水和土地与隐含碳、氮和磷的出口者。对环境足迹产生协同效应的SDGs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而对环境足迹产生权衡效应的SDGs,则要防范其实现进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此外,对于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显著权衡的SDGs指标,应尽可能规避他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本国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反之,则可作为未来区域合作治理的重点方向。

4、基于人粮关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研究

【来源】《自然资源学报》(2022年第3期)

【作者】张超,杨艳昭,封志明,郎婷婷,刘莹

【关键词】土地资源;土地资源承载力;人粮关系;时空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摘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重要的人口集聚区。以人粮关系为主线,从全域到国别研究了1995—2017年沿线国家土地资源承载力时空格局。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沿线国家耕地总量与人均耕地量分别降至 $6.96 \times 10^8 \text{hm}^2$ 和2.23亩/人,分别约为全球水平的50%和80%,约80%的国家人均耕地在下降;(2)承载力增至45.95亿人,近90%的国家在提高,但西亚及中东多数国家在下降;(3)地均承载力增至90人/ km^2 水平,约为全球水平的1.5倍,孟加拉国、匈牙利、越南超300人/ km^2 ;(4)人粮关系从超载转向临界超载,粮食盈余国家增多,主要为耕地面积广的产粮大国。半数国家土地仍超载,多为气候干旱区与岛屿国家。研究有助于深化与沿线国家的粮食安全合作和提高项目建设布局的科学性。

5、“一带一路”供应链安全研究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陈向博,郑凯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分析框架;供应链风险;供应链安全

【摘要】保障好中国的海外实物资产安全,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

一项迫切而重要的新课题。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对供应链风险及安全保障的见解基础上,应用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方法,以“一带一路”投资供应链风险为研究对象,以拓展供应链安全空间为分析视角,以构建“一带一路”物流服务体系为实现路径,以设计供应链安全“工具箱”为保障机制,构建了“一带一路”情景下的供应链安全分析框架,以期为保障“一带一路”投资安全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思路。

6、“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沿线省市产业结构优化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作者】陈瑞华,王飞

【关键词】“一带一路”;产业结构优化;PSMDID;中介效应

【摘要】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新引擎,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维指标,基于2010—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省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主要通过贸易调整供需机制、投资环境优化机制和科技创新改革机制促进了国内沿线省市产业结构优化,相较于“一路”沿线省市,“一带”沿线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更强。

7、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测算与评估

【来源】《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3期)

【作者】胡必亮,张坤领

【关键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与评估

【摘要】本文将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48个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发展所涉及的多个重要维度入手,构建一套综合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和双层评估模型,利用面板归一化方法,对中国和148个国家2015—2019年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评估。结果表明:(1)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综合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多数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呈上升趋势,以亚洲和非洲国家居多。(2)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综合发展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但经济增长比较稳定;二是资源禀赋总体上不是太好,但化石能源却较丰富且较集中;三是环境保护方面做得不错;四是社会发展水平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综合发展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整体不高;二是国家工业化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不高,经济转型压力较大;三是绝大多数国家的体量规模较小,国家发展规模优势较差。(4)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能源、产业、绿色发展、民生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8、基于SBM模型和时间窗分析的港口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效率研究

【来源】《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作者】朱乐群,张聆晔,李晓君

【关键词】港口效率;一带一路;SBM模型;时间窗

【摘要】为提升港口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在原有港口效率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利用SBM(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对我国港口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SBM模型和时间窗分析法能够解决忽略松弛变量所导致的效率偏差问题;港口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且整体呈现

上升趋势；提升港口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效率需要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投入和完善“一带一路”沿线港口航线网络来减少投入冗余。

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水平评价

【来源】《统计与决策》(2022年第7期)

【作者】程豪，荣耀华

【关键词】科技创新；二阶因子模型；偏最小二乘；分位回归

【摘要】共建“一带一路”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的重大举措。文章采用来自世界银行、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竞争力年鉴》的部分公开数据，以二阶因子模型为基础模型，通过现有的4种偏最小二乘估计算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进行评价。研究表明，科研投入产出对一国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均表现出相对较大的贡献。而随着分位数水平的引入，经济社会环境、科技人力资源和科研投入产出的作用均表现出随分位数水平的上升而增加的变化趋势。人口总数和GDP总量对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颇为重要，而他们所带来的影响的差异在低分位数水平时表现得最为明显。R&D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入学率对科技人力资源的影响，以及科技期刊论文和专利申请量对科技投入产出的影响，也表现出类似的规律。而在高分位数水平下研发支出对科技投入产出表现出相对显著的效应。

10、从单一型到多元化:傈僳族经济文化类型之嬗变

——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边境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李智环，曾小燕

【关键词】傈僳族；经济文化类型；嬗变；一带一路

【摘要】根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傈僳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属于单一的游耕游猎型。此种状况与该民族历史上没有间断过的迁徙活动关系密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民族整体进入了定居的生活状态，特别是近20多年来，他们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改变，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当下“一带一路”新时空背景下，依托历史迁徙路线打造文化走廊品牌、促进山地特色立体农业发展、扶持民族企业家及其企业，以及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口岸贸易，是今后傈僳族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实质性发展的科学路径。

11、“一带一路”沿线 FTA 与出口二元边际：基于网络分析视角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

【作者】彭羽，郑枫

【关键词】“一带一路”；FTA 深度；FTA 网络；中介中心度；出口二元边际

【摘要】文章基于网络分析视角，采用199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S6位产品层面出口贸易数据，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PPML)分析了双边FTA及出口国的FTA网络中心度地位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双边FTA深度提高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而出口国网络中介中心度地位提升则显著促进其出口扩展边际增长。这表明，沿线国家深度嵌入FTA网络有助于促进其出口多元化和降低贸易风险，弥补双边FTA主要促进出口集约边际带来的不足，避免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基于沿线国家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FTA深度和FTA网络地位的提升对初级产品出口国的二元边际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工业品出口国而言,双边 FTA 深度提升仅促进其出口集约边际增长,而 FTA 网络地位提升则促进其出口扩展边际增长;FTA 网络中介中心度提升对信息获取能力较弱的沿线国家出口二元边际促进作用更明显。

12、高质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研究:基于“蓝点网络”和 MCDF 的分析视角

【来源】《国际经贸探索》(2022 年第 4 期)

【作者】顾宾,徐程锦

【关键词】“一带一路”;蓝点网络;MCDF;亚投行;高标准

【摘要】建设高质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是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任务。从反面讲,国际上抹黑“一带一路”的各种杂音,多是围绕“低标准”入手的;美国发起“蓝点网络”倡议,有意通过打造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标准,制衡“一带一路”发展。从正面讲,我国于 2017 年发起倡议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成为继“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合作机制。MCDF 把“高标准”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可以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发挥引领作用。“一带一路”应当借鉴 MCDF 和“蓝点网络”的做法,围绕环境和社会保障、采购活动公开透明、公共债务可持续等议题,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高标准体系。

1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要素的共同影响分析

【来源】《环境科学研究》(2022 年第 4 期)

【作者】昌敦虎,缪琪,原佳倩,陶子怡,董战峰,白雨鑫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污染天堂效应;污染光环效应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际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997—2018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异质性分析和门槛回归方法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FDI 显著增加碳排放,体现出污染天堂效应。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FDI 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体现出我国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经济发展可削弱 FDI 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显著增加碳排放。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均导致 FDI 的碳排放效应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发展机制影响最大,创新机制的碳减排效果相对稳定。强化环境规制促进了 FDI 的污染光环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推动各国加强了环境规制。研究显示,为促进污染光环效应形成,应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利用来自中国投资的低碳化特征,增加与中国的投资往来并提高负有环境责任 FDI 的比例。各国也应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协同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引导 FDI 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此外,还应综合运用环境准入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政治法律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蒙双边投资协定的升级

【来源】《当代法学》(2022 年第 2 期)

【作者】史晓丽

【关键词】中蒙 BIT；国际投资协定；北京首钢等中国公司诉蒙古国政府案

【摘要】《中蒙双边投资协定》生效 28 年来一直未进行更新，其投资保护远低于两国对外所签国际投资协定的平均水平，北京首钢等中国公司在诉蒙古国政府国际投资争端案中的败诉与此不无关系，因此亟需更新或者以此为基础构建高水平的中蒙自由贸易协定投资规则。尤其是应纳入整体缺失的国民待遇，完善“投资”与“投资者”定义、最惠国待遇、公正与公平待遇、间接征收、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等条款，并纳入与可持续发展和公共政策有关的规定。

2、法治“一带一路”的内涵与构建路径

【来源】《国际法研究》(2022 年第 2 期)

【作者】王灵桂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一带一路”；法治“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国际法；涉外法治

【摘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建设法治“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贯彻落实，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因应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法治“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成为中国对全球治理提供的崭新智慧方案。建设法治“一带一路”，应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指导性原则，加强涉外立法、执法、司法体系建设，推动与东道国相关标准的协调和协同，发挥双边、诸边、多边经贸协议及对接机制的功能，不断加强国际法、国别法的研究和运用。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来源】《世界地理研究》(2022 年第 2 期)

【作者】吴丽君，朱宇，颜俊，柯文前，林李月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人口迁移；空间格局演变；社会网络分析

【摘要】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 1990—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增速加快，迁移路径更加多样化（2）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空间分布呈集中性特征，迁移目的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来源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3）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临近效应、国际地缘政治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4）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明显的社团结构特征，可分为独联体社团、中东欧社团、中东社团、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社团、北非-海湾-南亚-东南亚社团、中国内部社团。

4、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征转变、内涵再构与实现路径

【来源】《亚太经济》(2022 年第 2 期)

【作者】姜安印，刘博

【关键词】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征；内涵；路径

【摘要】在分析“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特征转变基础上，重新分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内涵。为了构建更加持续紧密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特别关注沿线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防控疫情、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减贫合作和实现发展权四个方面的现实利益，在合作时要注重持续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最后从短期、中长期和远期探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可能的实现路径。

5、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 OECD 和 RCEP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来源】《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李晓峰, 李士华

【关键词】文化距离; 海外移民网络;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调节效应

【摘要】近年来, 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 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 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 并利用 OECD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 OFDI 的关系; 海外移民网络促进 OFDI 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 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 团结海外移民力量, 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涉东盟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研究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作者】杨鹏

【关键词】中国—东盟; 一带一路; 商事调解; 商事仲裁; 仲裁规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

【摘要】调解与仲裁是两种并非完全平行的纠纷解决机制, 推动调解与仲裁有效衔接能够高效、便捷解决商事纠纷。根据调解与仲裁的适用先后顺序, 先调解后仲裁、仲裁中调解两种模式能充分发挥调解与仲裁的优势。我国涉东盟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既顺应了“一带一路”平等协商的发展理念, 也能调适价值多元和文化多样带来的冲突, 并能满足当事人对程序保障与程序利益的要求。目前我国涉东盟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可依据国内仲裁规则、部分国内自贸区制定的仲裁规则、国际调解与仲裁规则等诸多规范来高效低成本地解决商事纠纷, 然而, 我国涉东盟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和国际商事调解法律阙如、程序性规范过于原则而操作性不强、调解协议的效力审查标准以及恶意调解的责任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对此, 应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中心, 充分尊重当事人商事调解、商事仲裁、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的选择权; 制定专门的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的法律规范并适当变通; 加强具体程序设计, 根据当事人合意判断结果作出裁决, 明确调解期限; 注重调解书的审查与执行; 设立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机构; 提高商事调解与仲裁衔接人员素养。

7、超越西式全球化: “一带一路”与全球化再造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作者】史冬冬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西式全球化; 和而不同

【摘要】当今世界围绕全球化出现了两幅充满张力的图景: 一边是西方主要国家兴起逆全球化思潮与行动, 另一边则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初见成效。在全球化进程面临这种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 “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新型全球化模式的探索性方案。通过追溯全球化的历史痕迹可知, 这一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和时代性表征的特点, 自西方诸国进入资本主

义阶段而主导现代全球化进程以来,体现出霸权性和同一性的特征。因此,所谓逆全球化的兴起并非对全球化本身的抛弃,而是对西式全球化导致的世界失衡发展困境的反思。而“一带一路”在基本内涵、路径和存在逻辑上都有另一种不同的呈现,在异于西式全球化的同时力图超越后者的困境,针对当代世界谋求多元共同发展探索一种更为均衡普惠的全球化模式,并以此回应逆全球化的危机问题。

8、“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协调法律制度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 年第 2 期)

【作者】马忠法,王悦玥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产权国际协调;国际合作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尚不存在统一的知识产权国际协调法律制度,该领域的合作面临着参与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立法差异大、最不发达国家缺乏参与国际协调动力等挑战。然而,构建这一国际协调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它可以减少冲突、降低风险,是推动中国领先技术“走出去”的制度保障,能够满足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要求,而成为重塑 21 世纪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重要实践。为此,应循序渐进,构建有层次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由小及大,架构从区域内到跨区域的知识产权国际协调法律路径;中国作为倡议提出国,应积极牵线搭桥,贡献其智慧和方案,引领“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最终形成完整的、可操作的知识产权多边协调机制,以此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的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9、国际城市结谊与“一带一路”共建共赢——基于国际竞争力指数的经验证据

【来源】《财经研究》(2022 年第 4 期)

【作者】翁若宇,宁博,陈秋平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际竞争力;国际城市结谊;共建共赢

【摘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文章以 2008-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城市交流程度如何影响该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国际竞争力发展,深入挖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共建共赢的影响机制,并尝试对加速“十四五”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地生根进行有益思考。研究发现,在倡议提出后,历史上与中国友好城市交流程度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并且这一影响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行政机构、金融市场发展、劳动力市场效率以及商品市场效率等方面的全面提升。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内陆国、低收入国、外汇紧缺国以及高人口红利国来说,通过城市结谊有益于其更好地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成果。文章不仅揭示了国际城市结谊在落实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顶层设计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推进“十四五”规划的落实提供了政策参考。

10、“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幸福效应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作者】郭庆宾,汪涌,李世杰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幸福效应;经济发展;政府治理;环境改善;社会支持;个人选择自由

【摘要】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幸福效应是巩固沿线国家民意基础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途径的有力证明。为此，基于2009—2019年1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结合工具变量法与倾向得分匹配进行了进一步验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弱。“一带一路”倡议对政府稳定程度高、人口规模大、科研创新能力强、金融发展完善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幸福感提升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经济发展、政府治理、环境改善、社会支持以及个人选择自由渠道对沿线国家产生积极的幸福效应。由此建议推动幸福与经济的同步增长，推动完善沿线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强化科研创新能力开放合作。

11、贸易制度安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22年第4期)

【作者】曹芳芳，张静，李先德

【关键词】贸易制度安排；贸易效率；农产品出口；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摘要】基于2000—2020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考察贸易制度安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并测算贸易效率。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平均贸易效率仅为0.475，对印度、日本、越南、印尼、缅甸和俄罗斯等国家有较大出口潜力；贸易国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间越长，越能提升出口贸易效率；出口目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提升，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出口目的国司法效率、货币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贸易自由度以及金融自由度的提高有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而政府财政支出和商业自由度的提高却不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为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应充分重视出口目的国贸易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制度，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

三、经贸金融

1、“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

【来源】《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年第3期)

【作者】马晓燕，薛俭

【关键词】贸易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净额；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

【摘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往来愈发频繁，对沿线地区的辐射效应也开始突显。不仅为中国对外贸易开辟了新市场，也大大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吸引周边企业进驻、企业间相互学习、经验借鉴等方面发挥作用。但该倡议是否真正促进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何有效地识别、评估投资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实证研究部分采用了商务部每年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选取2008—2017

年这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作为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将人均GDP、出口总额、汇率变动率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匹配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沿线地区的对外投资效果进行实验检验,进一步证实实验结论的稳健性。结合研究结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中国企业积极响应了政府的号召,获得了政策红利;政策具有一定的动态效应,在倡议发布后的前两年对企业OFDI影响显著,后续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最后,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希望能够为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思路与借鉴。

2、进口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双边进口需求弹性的测算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刘瑶,张一平,王孟竹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进口需求弹性;无谓损失;影响因素

【摘要】进口贸易自由化是中国加入WTO后的重要承诺,扩大高质量的进口贸易也是推动中国“双循环”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章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20个国家2001~2018年HS-6分位进口贸易数据和关税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双边进口需求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进行了估算,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福利影响进行了评估和情景模拟。研究发现,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产品平均缺乏弹性,且略低于中国整体进口需求弹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关税的减让显著提高了中国的贸易福利,样本期内无谓损失占GDP的比重下降了67.70%;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关税继续降低10%、25%、50%,则中国因贸易限制而产生的无谓损失分别下降约19%、44%和75%。文章识别了影响进口需求弹性的因素,这有利于准确预测关税减让的进口促进效应与福利变化,为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3、“一带一路”倡议会提高企业成长性吗?

【来源】《中国注册会计师》(2022年第3期)

【作者】韩金红,曾晟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企业成长性;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摘要】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上市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受支持企业的成长性。进一步,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企业成长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受倡议支持的企业,受“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更多,进而更有利于企业成长性的提高。此外,本文还发现,在重点对接行业、国有产权以及我国中东部地区的企业,“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一带一路”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框架,也为政府部门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经济后果、完善相关经济政策提供了借鉴。

4、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双向贸易成本

——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的联立成本测算与贸易效应分解

【来源】《国际贸易问题》(2022年第3期)

【作者】王珏，冯宗宪

【关键词】“一带一路”贸易成本；异质性企业引力模型；联立测算方法

【摘要】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下的贸易成本联立测算方法，本文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的进出口双向贸易成本。该方法改进了Novy方法，利用Chaney引力模型构建了多边阻力项可解析的贸易方程组，可以在结果中区分出口成本和进口成本。研究发现：（1）在1998—2020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区域整体进出口成本分别下降了33.57%和19.43%，出口成本下降幅度低于进口成本。（2）中国对各国贸易成本基本呈现先降后增再降的倒“N”形变化趋势，仅有中亚和西亚部分国家的对华贸易成本自2008年以来持续上升。（3）贸易增长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的最大驱动因素，贸易成本下降对该区域贸易增长的贡献有待提升。这些结论对我国未来的区域合作政策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5、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吗

——基于“一带一路”数据的门槛效应研究

【来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作者】万晶，周记顺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劳动收入份额；“一带一路”；门槛效应

【摘要】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利用中国2003—2017年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数据探讨了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当OFDI强度小于门槛值时，OFDI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相反则显著抑制；“一带一路”政策使两者之间倒U型关系更显著。在进一步区分OFDI所属地区和投资动机后，发现我国东中部地区OFDI、对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OFDI和技术寻求型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倒U型关系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则表明，OFDI通过正向就业效应和负向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门槛特征，发现在就业门槛效应的条件下，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呈U型关系；在技术门槛效应的条件下，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呈现边际递减的规律。

6、“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效率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溢出及经济增长的视角

【来源】《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丝路基金青年课题组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对外投资效率；技术溢出；经济增长

【摘要】近年来，国际舆论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外投资提出诸多质疑，其中不乏对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批评。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就中国对外投资效率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效果。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本文推导出中国对外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创新构建了东道国从中国对外投资中所获得的研发资本溢出变量，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投资通过研发资本溢出促进了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本文还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按照地理区位划分为6个区域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不同区域投资效率存在差异。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效率最为显著，西亚北非、中亚地区次之；而对南亚地区作用不明显，中东欧、南欧地区可能受到地理、本国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

响,中国对外投资效率为负显著。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的政策建议。

7、物流绩效对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实证分析

【来源】《林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2期)

【作者】施正煌,郑雅静,戴永务,林伟明,黄国星

【关键词】木质林产品;物流绩效;“一带一路”倡议;出口贸易;面板数据

【摘要】木质林产品具有体积大、单位价值低的物流特性,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物流绩效可能影响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动能。基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别物流绩效指数数据,以中国物流绩效指数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物流绩效指数的交互项为解释变量,检验物流绩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物流绩效改善能显著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木质林产品出口增长;物流绩效、与中国贸易紧密度等变量能够有效缓解距离对中国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的阻碍作用。因此,首先要强化“一带一路”贸易优势,拓宽合作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市场;然后借助“一带一路”区位优势,发展共建物流基础设施模式;最后发挥“一带一路”平台优势,建立和维护农林类贸易协定组织。

8、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特征及推进策略

【来源】《体育文化导刊》(2022年第3期)

【作者】文思波,陈颇

【关键词】体育经济;“一带一路”;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等方法,对2014—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用品贸易特征与推进策略进行研究。呈现总出口规模呈波动状态但增长趋势明显,进口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特征以及国内贸易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一般贸易所占比重持续扩大,贸易市场集中度较高,贸易产品种类占比差异明显的结构特征。存在问题: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及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产品定位低端;国内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两极分化明显;市场风险较大;出口产品种类结构欠均衡。提出推进策略:完善国际贸易风险应对措施,提高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产品贸易竞争力;鼓励体育用品企业“西行”,充分挖掘中西部地区贸易潜力;提高体育用品贸易合作水平;优化贸易产品种类占比结构。

9、香港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及其释放效应研究

【来源】《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3期)

【作者】肖宇,夏杰长

【关键词】共建“一带一路”;香港投融资功能平台;人民币国际化

【摘要】中国香港作为国际著名金融中心,拥有发达的服务业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基础。香港要通过立足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定位,推动完善沿线项目在港融资机制;以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中心建设为契机,吸引香港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建设项目;发挥好香港服务业发达的独特优势,扮演好三方合作超级中介角色;借助香港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既有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0、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来源】《湖北农业科学》(2022年第6期)

【作者】徐金梦,王兆华

【关键词】水产品贸易;“一带一路”;竞争性;互补性

【摘要】选取“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水产品有密切贸易往来的代表性国家,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贸易互补性(TCI)指数以及格鲁贝尔-劳埃德(GL)指数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发展迅速,双边国存在不同贸易优势,应因地制宜建立合作机制;中国作为水产品出口国的TCI指数大于中国作为水产品进口国,双边国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双边水产品贸易表现出集中度较高特征,多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但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潜力还有待开发。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产品贸易发展。

11、“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五通”作用机制分析

【来源】《财经研究》(2022年第4期)

【作者】戴翔,王如雪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对外直接投资

【摘要】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的特有机制应该是“五通”。文章以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为先导,在科学构建“五通”指标体系并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利用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五通”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可以通过“五通”作用机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五通”分指标层面的作用机制看,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可以起到及时的促进作用,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畅通的促进作用还未显著呈现。第三,从基于分类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看,相比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五通”政策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的实践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洲,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非亚投行成员,中国对亚投行成员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

12、“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增进效应

【来源】《金融论坛》.(2022年第4期)

【作者】李俊成,李建军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海外投资;绿地投资

【摘要】基于2009-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相关企业海外投资的增进效应明显,而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和提高信贷规模是“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机制。基于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地投资,同时对企业的跨国并购亦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

13、“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绩效的促进效应研究

【来源】《中国物价》(2022年第4期)

【作者】李学迁, 罗玲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 企业绩效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以2014年为倡议的准切入点, 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的匹配数据, 采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具体表现在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的提升。通过置换代理变量和更换样本匹配方法估计结果验证了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最后, 针对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属性和企业规模分析, 结果发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绩效提升存在差异, 非国有企业优于国有企业; 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大规模制造业企业的绩效提升更明显, 对小规模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明显。

14、“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煤炭进出口的影响分析

【来源】《中外能源》(2022年第4期)

【作者】孟凡良, 张同功

【关键词】煤炭进出口; 优质进口来源; 合作机制; 基础设施建设; 电子商务

【摘要】煤炭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道路上将起到“压舱石”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煤炭贸易呈现出上升趋势, 并且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量一直保持较高比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我国开采、进口国外优质煤炭资源, 有利于我国煤炭走向国际市场。但与此同时, 一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备, 对我国煤炭进出口形成实质性阻碍; 我国煤炭出口地依赖度较高, 煤炭出口市场开发不理想。我国煤炭行业要紧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合理统筹规划, 做好与沿线国家的煤炭贸易协同合作, 在开发优质煤炭进口源的同时, 做好出口安排规划。从发挥市场优势、提高煤炭产业竞争力、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与法律制度、发展电子商务与金融服务等方面, 推动我国煤炭产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发展。